

本期导读

本刊编辑部

2014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提出的“三严三实”的精辟论述,为当前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指明了方向和标准,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守则和履行职责的基本要求。领导干部只有经常用“三严三实”这面镜子“照”思想,这把尺子“量”行为,身正为范,做出样子,要求别人才有底气、严格管理才能服众,承诺才能掷地有声。《无私树威 务实兴业》一文从如何做人、如何为官、如何用权等方面引经据典,联系实际,论述了领导干部只有心地无私,严以律己,严以修身,严以用权,才能在群众中树立威信;只有做人要实,谋事要实,创业要实,才能攻坚克难,务实兴业,造福一方。

20世纪80年代末,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交通的对外开放度,形成立体、双向对外开放格局,交通部提出了建设新亚欧大陆桥的战略构想。它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全长10900公里,横贯中国的东中西三大区域的11个省区和中亚、欧洲7国。1992年12月1日,连云港过境集装箱运输专列的开通,标志着新亚欧大陆桥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时任市委外宣办副主任的赵鸣同志,负责大陆桥开通前后的宣传推广工作,见证了新亚欧大陆桥开通的全过程,他撰写的《一桥贯欧亚 电波传五洲——新亚欧大陆桥开通前后外宣工作二三事》以亲身经历,向读者讲述了些许鲜为人知的故事,读来倍感亲切。

2014年5月19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上海共同推动了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项目的启动装置,这标志着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首个中外合作项目正式启动。作为海陆丝绸之路的交汇枢纽,连云

港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站在巍巍云台山,俯视连云港港口雄姿,回顾世界文明的开发,可以清楚地看出,传统的丝绸之路正是这条陆桥的前身。古代连云港地区是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连接点,既是这条陆桥西去的起点,更是东进的门户。《海上丝路说云台》一文,穿越历史的隧道,通过相关遗址遗迹及出土文物,细说云台山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丝万缕关系。

我市的新一轮编修地方志工作自2005年底正式启动,到目前,市县区志的编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大部分县志已进入分纂总纂阶段,《连云港市海州区志》率先出版发行,另两部区志已进入出版印刷阶段,一批部门志、行业志、乡镇志也将陆续出版发行。为了进一步提升全市新一轮编修地方志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市地方志办公室举办了地方志专题业务培训会,邀请了省市专家授课,为新一轮修志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现场把脉问诊。应广大修志工作者要求,本刊将分期推出此次培训活动的部分讲稿,以期对全市的新一轮修志工作有所帮助。本期推出《志书“凡例”编写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法》。

她是一名传奇女性。18岁参加反封建、反军阀游行示威;李大钊亲自动员她参加共产党;1927年被捕入狱,出狱后邓小平找其谈话,恢复其党籍;1928年秋,中央选派她去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被诬附和托派反党,由清党委员会开除党籍。其大风波传到上海,周恩来亲自写条子证明她没有问题;她讲课认真,深入浅出,是学生崇拜的好老师;她曾战斗在抗日斗争第一线;她是坚持边区斗争的好书记;她是建设大西南的排头兵。她是谁?与我市有何关系?详见孙苏林撰写的《铁骨丹心侠女情——张琼英的革命生涯》。





P15 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成的连云港庙岭煤码头



P33 新版《海州区志》编纂团队合影



P40 “佛从海上来”



P46 1935年成立的连云市政筹备处

目

群众路线专栏

- 04 无私树威 务实兴业 / 史连文
- 06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次整风运动的经验与启示 / 徐 亮
- 09 党的群众路线与全面深化改革 / 赵维娜
- 12 浅析群众路线在史志编研工作中的运用与思考
——以古今志书比较为例 / 贾栋钰

历史与发展

- 14 实现东方大港梦的导航人(3)
——深切回忆谷牧同志与连云港港口建设工作 / 叔 泳

人物春秋

- 18 铁骨丹心侠女情——张琼英的革命生涯 / 孙苏林
- 21 求真务实的老报人——和杜庚同志相处的那些往事 / 张学贤

往事追忆

- 24 一桥贯欧亚 电波传五洲
——新亚欧大陆桥开通前后外宣工作二三事 / 叔 鸣

史志研究

- 28 志书“凡例”编写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法
——以连云港市县区志为例 / 陆瑞萍



录

- 33 《连云港市海州区志》(1986~2005)编修过程中注重把握的几个问题 / 孙大伟

读史评志

- 36 浅议《海州区志》的科学性 / 张树庄
- 38 求真秉性 存实显真功——读新版《海州区志》有感 / 崔月明

郁洲溯源

- 40 海上丝路说云台 / 木荣
- 42 小村曾设宰相府
——《寻古云台山十八村》之三 / 伏广喜 张茂田
- 45 连云港地名考 / 蔡立志

风物览胜

- 48 连云港市水利碑补遗 / 张卫怀

封二:史志掠影

封三:石上墨韵

——连云港石刻拓片精选

本刊启事

1. 本刊发表的署名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文责自负,不代表编辑部意见。
2. 本刊对来稿有编辑修改权。
3. 本刊严禁一稿多投,来稿不退,3个月内未接到本刊通知的,作者可自行处理。

《连云港史志》编委会

顾问: (以姓氏笔画排列)

古龙高 江行洲 刘畅征
许燕豪 杨春生 李洪甫
张学贤 张良祥 彭云
韩世泳

主任: 苏中保

副主任: 张斌 郝廷旗 陆瑞萍

委员: (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忠新 王滨 刘鹏
邱仕明 何洪斌 姜芳才
郝芳 董毅志 韩翠林

主编: 苏中保

副主编: 张斌 郝廷旗 陆瑞萍

责任编辑: 邱仕明 张伟敏 于冰清

文字总校: 张俊鹏

2014年第3期总第93期
(内部资料 赠阅交流)

纵览历史借古鉴今
展现风貌追溯渊源
立足港城洞开窗口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地址: 连云港市新浦区朝阳东路69号

邮编: 222006

网址: www.lysz.gov.cn

电子邮箱: LYoshitan@163.com

电话: (0518)85825137 85821368

印刷: 连云港市百草椒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 苏新出准印 JS—G033号

出版日期: 2014年6月





史连文

2014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三严三实”的精辟论述，直指人为政的根本，切中干事创业的要害，切中了作风建设的脉搏，为当前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指明了方向 and 标准，也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守则和履行职责的基本要求。

与中国传统修齐思想“体恭敬而心忠信，述礼义而情爱人”的狭义修身不同，总书记的严以修身，是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严以用权，是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是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

做人，是做官的前提。作为取决于本人的修为，有了外在的“他律”，还得有内心的“自律”，才能形成真正的纪律。不因恶小而为之，所有的大错都从小错日积月累，所有大问题都从小问题引发。我们不能寄望于最后的悬崖勒马，最好的办法是不去走那条通往悬崖的小路，凡事按制度和规定走，于法有据，如此，方可行走在正道上。一个人的业余时

间，如果填充的不是健康兴趣，就会是不良嗜好。一旦饮酒、赌博等成为八小时以外的兴趣爱好，这条路的终点必然暗淡无光。

有权力的地方必然有诱惑。面对当下市场经济大发展而制度建设不健全的客观环境，思想防线不牢，往往要摔跟头。谨记“三严”，就能练就思想上的“金钟罩”，就能守得住底线、守得住操守，增强抵御各种“病毒”的免疫力，确保权力运行始终不偏离为民利民的轨道。一些领导干部最初信誓旦旦“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时间久了思想懈怠，被糖衣炮弹击中后想法变成“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等到开始伸手了又变成“既然湿了鞋，不如洗个脚”，越走越远之后则是“既然洗了脚，不如洗个澡”，彻底滑入贪腐深渊。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领导干部要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基础是公正廉明。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从严治党、从严要求、从严制约，才能破除私心、成全公义。行得正，才能走得稳；要求严，方能干成事。守得一个“严”字，外无愧于人，内无愧于心，才能实践党的根本宗旨，廉洁奉公、夙夜在公以致两袖清风、一心为



民的境界。

祸莫肇于放纵。诸多事实表明,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并不难,怕的是居官日久,不再“严”字当头,而生骄气、惰气、官气、暮气;怕的是顺境时目中无人,稍有不顺,则怨天尤人,而放浪形骸;怕的是美色、贿赂,各种腐败微生物乘机入侵,以致病入膏肓,焉得善终?律己以严,方得平安风顺。对自己从严要求,不仅是做人做官的本分,也是平安生活的保障。反躬自省,每日三问,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更应懂得,“清风一路”,才能“一生无悔”。

立德还须立功。在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今天,历史赋予各级领导干部奋发有为的责任和义务。是谋实事还是谋虚功,总书记指明了方向:即谋事要实,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创业要实,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做人要实,就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

“实”是责任。群众认干不认说。老开“空头支票”,何以取信于民?尽搭花架子,何以攻坚克难?有什么样的作风,就有什么样的作为。只有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才敢于“在困难面前逞英雄”。所谓“实绩”,求实是基础,绩效是结果。从一地“烂尾楼”,到办事“跑断腿”,发展之痛、民生之苦的背后,往往存在作风之弊、行为之垢。那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金玉其外的“路边政绩”,脆弱如纸糊一般,今天是个人的仕途垫脚石,明天却是东窗事发的导火索、一方发展的绊脚石,折射的是思想上的公与私,私欲膨胀就会蝇营狗苟、弄虚作假,把政绩异化为个人的资本。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人们对领导干部功绩的最真实评价,往往是在岁月洗尽铅华之后。当此之际,任上干了些什么,任后留下些什么,清晰可见、无可虚饰。有的人在任上热热闹闹,卸任后人们发现像样的事情一件也没干。有的人倒是干了,但职务上去了,债务留下了;人调走了,项目烂尾了;在任时干的事不少,不几年就隐患重重;任上政声显赫,任后骂声一片。凡此种种,除了其个人或小团体一时得着益处,更多的是误国误民。

“实”是行动。为政贵在行,以实则治。当前全党

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就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做好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今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身负改革重任,面对各种难题,弘扬务实之风,不仅是做人的准则,更是谋事创业的方法论。“名必有实,事必有功”,转型发展,离不开因地制宜的谋划、资源环境的考量;改善民生,有量力而行的理性、尽力而为的落实,才能把好事办好。不驰于浮华,不骛于虚声,沉下心来医痛点、解难事,这正是深化改革最需要的政治品质。

“实”是期望。群众交给干部的是权力更是期待,组织授予领导的有职权更有责任。领导干部接过权力就要负起职责,就得有对得起信任,就要以求真务实的工作追求不掺水分的政绩,以忠实于党和人民的行动赢得群众拥护。作为史志工作部门领导,当下就是要同大家一起,高质量地完成二轮修志工作,开展党史三卷修编工作,创新方式方法,有效做好存史、资政、育人,站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第一线,发挥史志工作在弘扬先进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实”是能力。板凳要坐十年冷,积淀的是功力;腹有诗书气自华,散发的是底气。有了功力和底气,才会有发展能力,干事有想法,处事有章法。一些领导干部,遇到难题往往采取“鸵鸟”政策,把矛盾“盖”起来,让自己“藏”起来;推动改革总是习惯“挂空挡”,不敢迎着困难上、顶着压力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笨办法不顶用。既无法向前迈步,又不甘落于人后;既没有能力水平,又怕说自己不行。于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来了,你要求绿化环保,他给你来个荒山涂绿漆;你要求化解矛盾,他给你来个封堵堵压瞒;你要求调整利益,他给你来个各打五十大板……表面如火如荼,实则一地鸡毛;看似动作不少,只是原地空转。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严三实”是衡量人为政的基本要求,也是检验党性原则和执政能力的具体标尺。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但“四风”之弊非一日养成,其顽固性决定了祛除“四风”也非一日之功。领导干部只有经常用“三严三实”这面镜子“照”思想,这把尺子“量”行为,身正为范、做出样子,要求别人才有底气、严格管理才能服众,承诺才能掷地有声。

责任编辑 邱仕明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两次整风运动的经验与启示

徐 亮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在中国政治的舞台上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政党,仅拥有 50 多名党员。经过 90 多年的发展,我们党已成为拥有 8 千多万党员的执政党,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90 多年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是与我们党独具的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理论品质,是与我们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宗旨密不可分。因此,回顾和梳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整党整风教育,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两次整风运动概况

(一)延安整风

1. 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

19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从组织上保证了党能够在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正确道路上顺利前进。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抗战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从而保证了党的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发展。但是,王明“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并没有得到系统的彻底清算,党的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而且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在党内也有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使部分地区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未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因而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同时,党在全国抗战初期的大发展中增加了

70 余万新党员。这些新党员革命积极性虽然很高,但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使党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由于他们的阶级出身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很容易受到一些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

另外,敌后抗日斗争虽然还处于困难阶段,但总的斗争形势变化较小,特别是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局势比较稳定,中共中央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并有一批比较了解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骨干,因此,有可能集中精力进行一次全党性的整风运动。

2. 延安整风运动概况

延安整风运动分为两个层次进行,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之后是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全党整风。

1941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尖锐批评了主观主义作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7 月和 8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克服各种不良倾向和作风。9 月 10 日至 10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主题报告,并于会议进行中,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同时决定成立



各地高级学习组。

1942年春,全党普遍整风开始。2月下旬,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阐明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在全党引起强烈反响。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在总学委领导下,延安的各单位、各系统及华北、华中各根据地 and 中共中央南方局,先后开展整风学习,同月,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后,文艺界也进行了认真的整风学习。全党普遍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此次整风运动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作出正式结论后结束。

(二)1947年至1948年整风运动

1. 1947年至1948年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的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到1947年党员已发展到270万名。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在内线和外线的配合作战,构成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国民党军队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根据中共中央《五四指示》进行的土地改革取得初步的成效。

但是伴随着革命形势的大发展和土改运动火热进行而来的,是一些党组织特别是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出现的诸如有的党员利用职权侵占群众利益,多分多占土改果实;有的干部严重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脱离群众;有些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混入党内,甚至把持了基层党和政府的领导权,作威作福,损公肥私,欺压群众;扩大打击面的“左”的倾向等问题。党中央认真分析了这方面的情况,认为这些是土改不彻底的重要原因,决定结合土改进行整党。

2. 1947年至1948年整风运动概况

1947年7月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着重讨论土改和整党两大问题。会后,各解放区党组织在开展土地改革的同时,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的部署,开展了整党工作。

这一次整党的基本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说服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以“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整顿思想、纯洁队伍、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在各解放区开展整党工作的同时,从1947年冬至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也利用战斗间隙,从阶级教育入手,运用诉苦、“三查三整”等方法,在全军普遍地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

二、两次整风运动对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几点启示

1.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新形势下的必然要求

回顾两次整党整风运动,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的整党整风运动,都是在我们党面临新形势、新任务的情况下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开展的,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面临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同时,党内的“左”倾错误思想还没有彻底地铲除。1947年至1948年的整党运动,是在中国革命战争达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形势下,结合土改运动开展的。

当前社会,世情、国情、党情都有了深刻的变化。我国经济总量虽已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但总体上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对外依存度高,风险较大。西方敌对势力从未放弃对我国的遏制,不断利用经贸、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向我国施压,我们将长期面临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的“西化”、“分化”和“三股势力”发起的破坏分裂活动;另外,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差距拉大,贫富分化严重。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这突出表现在各个群体之间的对抗性增强,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民族宗教矛盾纷杂交织,干群矛盾日趋突出,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四大考验和“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因此,只有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才能统一全党思想、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才能最终实现“两个100年”和“中国梦”的伟大目标。

2.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必须以人民群众为主体

群众路线一直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做到了弄清思想、纠正错误,实



现了团结同志、共同进步的目标;1947年至1948年的整党运动,通过“三查三整”,清除了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分子,吸收广大贫农、中农参加党的会议。在党员内部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讨失误,促进干部和群众更好地融合,密切了党同群众的关系,保证了土改的顺利进行,有力支援了解放战争。因此,开展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必须坚持人民群众主体地位不动摇,只有牢固树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才能真正地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和群众观念,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进一步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3.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必须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在两次整党运动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也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毛泽东在“七大”总结延安整风的经验时就曾指出:“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样,这也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必须贯穿始终的总要求,落实到具体,就是“照镜子”,以党章为镜,对照党的纪律、群众期盼、先进典型,对照改进作风的要求,在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上摆问题、找差距、明方向;“正衣冠”,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勇于正视缺点和不足,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敢于触及思想、正视矛盾和问题,从自己做起,从现在改起,端正行为,自觉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保持共产党人良好形象;“洗洗澡”,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治治病”,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对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提醒,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查处,对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4.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有的放矢

历次的整党整风运动,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每次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所以整风运动的开展必须实事求是、找准问题,有针对性地把握整顿作风和解决问题相联系,这样,既转变了作风,又

解决了问题。延安整风运动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并专门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中央领导深入一线进行调查研究,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找出问题的核心;1947年至1948年的整党运动,是在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最紧张的时刻进行的,之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进行,是因为党及时认识到了工作中存在着“左”倾错误以及党内不纯的问题。当前,一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重,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能无视、回避、粉饰客观问题的存在,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这些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的条件。

5.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必须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垂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两次整风运动都是由中央带头,从领导做起,顶层设计,上行下效,全党动员,上下互动。延安整风运动从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开始抓起,以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整风为重点,带动全党干部的整风;1947年至1948年的整党运动,也是由中央发起,并在运动过程中密切注视,发现问题后,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从中央到地方,都特别强调领导带头。早先出台的“八项规定”非常具体,针对性、操作性非常强,国家领导人的示范作用、榜样效果进一步促进了全社会学习、实践“八项规定”,进一步促进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

党的历次整风运动,包括当前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要通过整顿作风,牢记党的宗旨、牢记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只有这样,才能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大危险”,切实肩负起实现“两个100年”和“中国梦”的历史责任。

(作者单位:市委党史工办)

责任编辑 邱仕明



党的群众路线与 全面深化改革

赵维娜

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同时为改革开放指明了正确方向,赋予改革开放巨大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的成就充分说明了新时期继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必要性。如何立足改革新形势,续写群众路线的新篇章成为当务之急。笔者对此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贯穿“为民”主线;协调利益关系,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加强作风建设,秉承“打铁还需自身硬”;创新制度建设,确保“常态化长效化”等建议。

一、群众路线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认识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的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历届领导集体始终强调和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创新思维,破解难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群众路线也在不断经验总结和实践检验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把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并将群众路线和社会主义本质、改革开放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关注人民的物质利益,切实提高人

民的物质文化水平,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党的工作。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建立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和决策执行程序,坚持领导干部深基层和深入群众,加强廉政建设和党风建设,建立和完善党内外监督制度等方面对群众路线工作方法进行了发展。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党的群众路线与科学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正确的人才观结合起来,要求全党要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群众观,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树立为群众办实事、务实效、求实绩的政绩观;坚持人才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的人才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当前形势,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旨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

二、群众路线为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动力和有力保障

1. 群众路线指明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改革开放 36 年来,党和人民经历和战胜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挑战。无论是东欧剧变、苏联



解体、西化、分化图谋,还是应对改革中各种问题,我们党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归宿,注重倾听人民的心声,真正将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出台各项改革政策的依据。

改革最终是为了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始终恪守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才能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发展的目的、稳定的基石,才能在各种利益抉择时保持正确立场,在各种关系协调时,做到统筹兼顾;才能保证改革的红利体现在人民切身利益上,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群众;才能使社会主义事业得到更多的支持,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坚强,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

2. 群众路线赋予改革开放巨大生机活力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邓小平说过“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改革中许多新的东西,无不是依靠了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小岗村18位农民的首创精神,促使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蔓延至全国;华西村破茧成蝶的神话,打响了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集体企业组织的“第一枪”。

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群众中来”,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吸取人民群众的改革智慧。改革中如何破解发展难题,创新发展模式,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制,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这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党的创新与人民创新相结合,充分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群众对需要改革的体制机制弊端往往有切肤之痛,对如何改革也有一套来自实践并被实践检验的好办法。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促使党的政策主张不断完善,党对于改革举措的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成熟,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到群众中去”。正确的顶层设计,合理的改革理念最终还要靠人民群众

的实践来完成,“不吸引更多的人民阶层参加社会建设,不激发一直沉睡的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改革”。只有将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更好地依靠群众,才能广泛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的活力。

三、立足改革开放新形势,续写群众路线新篇章

1. 思想层面:坚持“以人为本”,贯穿“为民”主线

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各种不良环境的诱惑下,一些党员干部对群众路线认识淡化了,对于脱离人民群众风险不敏感,对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复杂性认识不足。针对以上情况,必须以极高的政治责任感,以崭新的理论工具和工作方法来警醒全党,只有更加旗帜鲜明地坚持以人为本,贯穿“为民”主线,以人民的需要确定发展目标,依靠人民推动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激发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必须使广大党员干部正确看待权力与群众的关系,自觉将权力置于人民群众之下,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对于“为民”有更敏锐、科学、理性的思想认识。

2. 利益层面:协调利益关系,营造“和谐”社会环境

马克思在分析人的行为动因时指出:“人的行为与利益密切相关”,人们的“每次行动”都是“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的”。利益是人活动的主要动力,也是导致社会矛盾产生后趋向缓和或是对抗的根本原因。针对目前群众内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差异化、利益表达和维护方式多样化、利益纠纷复杂化的特点,我们要创新思路,协调利益关系,为改革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首先,坚守“人民利益至上”原则。一切决策必须建立在承认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各种利益要求上面,要把坚持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改革的力度不能小,发展的速度不能慢,社会的承受度不能冒,归根结底还是要竭尽所能实现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利益。

其次,兼顾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利益差别和矛盾是一个社会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必须协调和处理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各方面之间的利益关系,逐步完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和调处机制,切实解决利益分配中差别悬殊和不公平问题;必须特别关注并认真应答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尤其是困难群体的民生诉求。

3. 党建层面:加强作风建设,秉承“打铁还需自身硬”

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四种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 8500 多万党员、在一个 13 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只有加强作风建设,以改讲作风正党风赢民心,以作风改讲惠民生促和谐,才能使党自身坚如磐石,才能实现“打铁还需自身硬”。

首先,反对“四风”,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坚持实干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坚持亲民爱民反对官僚主义,学会打“亲民牌”“爱民牌”,真正走进群众,真心把老百姓当做自己的亲人;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要坚持节俭反对奢靡之风,带头消除“舌尖上的浪费”,管住“车轮上的腐败”。党员干部在工作生活中,自觉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提高自身的为民服务水平。

其次,培育榜样力量,固本培元。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价值观念不断涌现,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人们的道德观念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我们需要精神的力量来巩固思想阵地。习总书记指出:“把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一条红线贯穿活动始终,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学、细照、笃行”。我们要培育更多焦裕禄这样的榜样力量,通过发现、褒扬、学习和宣传一个榜样,在社会和全党竖起一个标杆,确立一种道德风尚,弘扬一种主流价值理念。

再次,以整风精神严格党内生活。新形势下,我们要探索以整风精神严格党内生活的新思路,以民

主集中制为核心,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武器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以严格组织生活为载体纯洁党的队伍,以坚持党性原则为基础增强凝聚力,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提升执行力。

4. 制度层面:完善制度建设,确保“常态化长效化”

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效性。贯彻群众路线既要立足当下,又要着眼长远;不仅要着眼提高认识,锤炼党性,更要注重建章立制。只有完善制度建设,才能确保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常态化长效化”。

首先,推进主动服务群众制度。采取结对认亲、联村帮户等方式,强化党员的主动服务意识;创新干部考评机制,把党员干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情况作为民主评议、党性分析评议和考核评优的重要内容;创新干部推荐选拔制度,建立和完善群众推荐自己信任干部的制度,建立干部主动向群众报告履职情况的制度,接受人民群众的评判,使得干部自觉将自身命运和群众的利益联系起来,更加主动服务群众。

其次,健全维护群众利益制度。建立群众利益诉求反馈制度,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搭建各种形式的沟通平台,积极发挥各类媒体的作用,形成“民意收集制、民意听证制、民意质询制、民意协调制、民意办结制”为一体的社情民意反馈制度;建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决策制度,建立健全重大角色风险评估机制和决策行为监督、决策实施跟踪监督、决策失误纠偏问责机制,防止因决策不当损害群众利益;围绕民生,建立健全利益引导、约束、调节、补偿机制。

再次,完善干部廉洁从政制度。一要完善监督机制,切实增强监督实效。建立立体式监督网络,将纪检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媒体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建立信息化监督平台,拓宽监督途径,增强监督渗透力。二要探索预防官员腐败机制,减少行政审批、实现官邸制、完善官员财产公示制等方式,减少腐败机会。

(作者单位:市委党史工办)

责任编辑 邱仕明



浅析群众路线在史志编研工作中的运用与思考

以古今志书比较为例

贾栋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作为时代的产物，当代史志编研工作本身在框架内容、编纂过程、实践运用等方面深刻地打下了时代烙印，体现着群众路线的内涵精神。

以古海州志中获赞最高的《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为例与第一轮修志成果《连云港市志》做一个简要对比，即可看出《连云港市志》在体现群众路线精神方面所蕴含的时代特征。首先，从框架结构上看，《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正文以两篇“纪”的形式开头，主要是讴歌皇恩浩荡。一篇记载皇帝颁赐海州地区御书，另一篇则记述清顺治至嘉庆年间朝廷对海州地区施行蠲免赈贷和增加科举录取名额的优惠政策。在记述海州历史沿革情况和大事记后，接着介绍的是海州地区历任职官、科举人员情况，以及符合封建道德观念的忠臣孝子义民和烈妇贞女等。与之相比，《连云港市志》在大事记后分别编排自然环境、建置区划、区县概况、人口等，优先对市情市貌、风土人情等群众关心的内容进行记述。

第二，从人物主体上看，《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主角多为帝王将相，所树碑立传的人物也多有为科举功名的人物，范围较窄。而《连云港市志》则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在内容选择中则注重表现当时的百姓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等。在为人物立传记述时，《连云港市志》所选人物标准为对连云港历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或较大影响的人物，包括劳动模范、先进典型等一大批群众中的优秀代表载入史册。在入志人物选取范围上较《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有了较大的拓展。

第三，从内容上看，《连云港市志》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面，要素齐全，内容丰富；而《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内容主要以政府行为为主，如旌表忠臣孝子烈妇贞女、征缴赋税等。这一方面与古代社会生产力较低，发展要素较少有关，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其思想上的局限。

因此，当代史志编研工作本身即体现着时代发展的特性，蕴藏着群众路线的精神内涵，体现着群众观念的进步。当然，任何一部史志作品都不能脱离历史时代的大背景孤立分析，过分苛求《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作者显然也有失公允。在此只是利用古今志书做一个简单对比，用以说明《连云港市志》所蕴含着的群众路线精神。同时应该看到的是，在志书的开发利用方面，《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在今天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散见于《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中的长篇历史评论和寥寥数语的精到点评虽然在今天看来有违“述而不作”的宗旨，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一些点睛之笔有助于帮助后人更好地了解分析当时的真实历史，有利于继任者更好地判断反思过去政策执行中的得与失，有益于为政者更好地探索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经验。

历史是一笔沉睡着的巨大宝藏，需要透过字里行间去窥视挖掘其背后隐藏着的诸多价值。无论是古为今用还是以史鉴今，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在“今”字上。清代三吴督学使者万承风在《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海州志



序》中提到,“余奉天子命,视学江苏,古采风传也。下车伊始,即征集郡邑志乘,以资见闻。”一部被束之高阁、尘封历史的志书显然不能称为精品良志,发挥“以资见闻”的作用。围绕志书进行更深层次的开发利用就成为推动方志实现“经世致用”的重要渠道,以下从三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一是发挥资政作用,服务政府决策。政府决策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如果能在反思史实、研究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进行深入思考,进而服务大政方针的科学决策,这样无疑能够间接对服务群众、服务民生发挥积极作用。以《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盐课”篇中所引用的明代张峰《盐课论》为例。在《盐课论》中,张峰围绕明代的盐务政策展开论述,反思当时盐务政策弊端,认为“私价本不及厘,而以二厘领官盐而卖,法似太峻”。同时结合自己主理政务时的切身感受和政策执行的实际情况,阐述盐务政策不当给百姓造成的危害。“余理州事,见商人告负引盐者无虚日,知灶户之贫也;领卖官盐,价多赔偿,知铺户之累也;巡获私盐,月有定数,不足则以工食扣补,知官兵之苦也;徐、邳盐徒,动连什百,得利则行盐,失利则行劫,官府不能制;而挑贩小民,执之以充月数,又从而徒杖之,知民之为病也。”(《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第十七·考第四·食货六·盐课》)值得注意的是,创作这些精彩点评的张峰、唐仲冕等,多为海州一地的主政者或参与主政者。作为决策的实际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个人所具有的对地方发展的全局眼光、对具体问题的整体考量、对政策执行的现实体会等先天优势显然不是大多数人所能具备的条件。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代社会社会化分工更加细致,“隔行如隔山”的现象也更加普遍。这无疑对地方志资政功能的发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一部区域性的地情百科全书,地方志的优势在于其内容综合性强,覆盖面广,能够涵盖地域内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但同时如果只有对史实的基本记述,而无相应的规律总结和政策反思,史志的资政价值发挥显然将受到一定影响。如果能在立足地方志综合性优势的基础上,选取一定领域作为研究方向,通过占有掌握分析资料,对史实进行规律提炼和本质挖掘,使知识结构逐渐由广博发

展至专攻甚至于精通,应该更有利于提升资政质量、增强对服务决策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是要打破“述而不作”的原则、影响史志的客观性,而是旨在史论结合、编研统一。围绕地方志这一原始资料进行开发利用,从单一的政策思考讲而至跨领域综合研究甚至于承担课题任务等,从而有效提升其附加价值,更好地发挥资政功用。

二是明确市场分层,做好针对性开发。《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主要阅读者和使用者多为当政者或科举精英,如唐仲冕在《自叙》中所说的“欲使居官者视已成事,因地制宜”(《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录第六·叙述二·自叙》),但这种情况的形成与当时社会思想认识不无关联。在现代文明快速发展、服务理念日益增强的今天,依据不同层次的群众需求进行针对性的史志资源开发利用应有其一定的发展空间。在探究读者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潜在的读者群体、阅读市场进行细化分析,针对专业研究、地情了解、旅游文化推介、乃至对外宣传等不同方面的群体需求开发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史志文化产品,并加以策划营销和推广应用,在满足群众个性化需求的同时,逐步提升自身品牌效应、增强和扩大史志编研的影响力。

三是挖掘历史价值,服务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往往赋予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提升城市发展的软实力,优化城市形象。在挖掘历史价值方面,史志编研在资源占有上具有一定的先天优势,关键在于如何提炼。在把握区域地情的基础上,横向比较同一历史时期其他区域的发展状况,纵向思考同一区域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并结合当下热点从中挖掘富有历史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的史实加以分析阐述,探索城市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定位,并以此服务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综上所述,当代史志本身即体现着时代赋予的群众路线内涵思想,史志编研过程中又蕴藏着实践运用群众路线的现实智慧。当下,随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蓬勃开展、对群众路线认识和思考的日渐深化,史志编研工作必将进一步在践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中发挥体现其独特的作用和价值。

(作者单位:市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邱仕明



实现东方大港梦的导航人(3)

——深切回忆谷牧同志与连云港港口建设工作

赵 泳

(接上期)

三、“大打大闹”开辟庙岭新港区

周恩来总理“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指示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沿海港口建设,也加快了连云港港的建设步伐。从1973年—1978年的六年中,国家对连云港的投资达12325万元,相当于1973年以前24年投资总数的4.16倍,港口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1977年8月,新华社内参上刊发了题为《连云港港口建设取得很大成绩》的报道,全面介绍连云港港最近几年取得的建设成果和发展变化,以及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9月16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作了重要批示。批示全文为:

这个港口大有前途,大有希望,应当十分热心建设好这个港口。要建设更多更大泊位的深水码头。情况虽然复杂,困难可能很多,但还是应当把这个项目列入计划,哪怕时间长些,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也应当下决心建设,逐步投入生产。还可以考虑进口大型挖泥船,加快深水泊位的建设进度。初期,只要领导政治挂帅,又能充分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终究可以把连云港建成一个很大很好,甚至可以与现代化名港媲美的港口。”

1977年11月21日上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亲临国务院港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贯彻落实李先念副主席的批示,加快连云港港口建设作出了重要指示。谷牧指出,连云港是中国的重要港口,位于我国沿海的脐部,地位非常重要。铁路从东到

西,横的有陇海铁路,纵的有津浦铁路,还有京广铁路,可以向南北疏散物资。还有宝成铁路通四川,陇海铁路最后通新疆,涉及8个省区,经济腹地广阔。军队同志积极性很高。从经济上、军事上都很需要。中央考虑要大闹连云港,不是小打小闹,也不是中打中闹,而是大打大闹。江苏省对连云港建设气魄很大,要建5万、10万吨级码头,要大搞,还要把铁路大桥搬去连接东西连岛(即后来建设的拦海大堤——西大堤)。当谈到连云港回淤问题时,谷牧一再强调,在连云港建设10万吨级的码头,是否可行,要抓紧研究。要有科学态度,不要在经济上受损失。

为了落实李先念副主席和谷牧副总理的指示精神,国务院港口建设领导小组和交通部分别于1977年11月29日和12月8日,在北京专门召开了连云港港口建设规划座谈会。会议认真讨论研究了连云港的回淤问题和建设10万吨级深水泊位的可行性,以及连云港港口规划方案,并具体安排了下一步连云港港口建设的重点工作。会议经过讨论后认为:“连云港的回淤问题已经搞清楚,可以建设现代化深水大港。”对于连云港港口未来建设总体设想是,“从长远着眼,应以连云港为中心,北起岚山头,南至灌河口,统一纳入连云港总体建设规划,分期、分批将其建设成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拥有先进技术装备的现代化深水大港的港口城市。近期建设,以连云港为重点,同时积极做好岚山



头与灌河口的建设规划工作。”

会议还对连云港港口的总体规划做了深入细致地研究。确定“近期设想从连云港西端的黄莺嘴修建 6.7 公里海堤,与连岛小龟山相连,围海造陆 15 平方公里,使得连云港形成新港港池。远景视发展需要,尚可在连岛外侧修筑防波堤,形成外港池,并向岚山头和灌河口方向发展。”“整个港区逐步拟按四个部分布置。老港区以杂货为主,发展客运码头;庙岭以散杂货为主,发展木材、钢铁、集装箱、滚装码头;连岛地区,发展散货、集装箱和各种辅助码头;墟沟地区则以中小泊位为主。10 万吨级的大型深水泊位近期以庙岭为主,远期可在旗台嘴或连岛地区发展。”今天我们再看连云港的发展规划和建设现状,就不能不感受到当时决策的深谋远虑和高瞻远瞩。事实上今天连云港的发展基本是遵循了这次会议的构想,并在逐步完善和克服种种困难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交通部党组听取了会议情况汇报,确定连云港建设按照三大战役来完成。一是第一期工程,将原定的庙岭煤码头由原来的 2 个 2 万吨级和 1 个 3 万吨级改为 2 万吨级、5 万吨级和 10 万吨级各 1 个,吞吐能力为 2500 万吨,并建设黄莺嘴到西连岛拦海大堤。两项工程要求在 1981 年基本建成,总投资约 4.6 亿元。第二期工程到 1985 年基本建成庙岭港区的 16 个至 18 个泊位,综合吞吐能力

达 5000 万吨左右。第三期工程是 1995 年前完成海峡内的全部工程。

1977 年 12 月 8 日上午,国务院港口办听取了汇报,基本肯定了这一方案,要求尽快写出书面报告、设计任务书,报国家计委和中央领导审定。会议还对连云港建设中的两大重点,即软基处理和回淤的科研项目,要求组织各方面力量集中攻关,继续深化和完善。

从李先念副主席的批示,谷牧副总理的全力推进,到中央各部委和各相关单位密切配合,以及连云港港口建设者们的不懈努力,连云港的发展又跨出了一大步,跳出了原有的连云港老港区,进入了庙岭新港区,基本解决了后方陆域狭小的问题,为后来亿吨大港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对外开放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束缚

上个世纪 70—80 年代是一个计划经济为主导的时期,连云港港口建设所有项目和资金审批均由国家审定批复,资金来源均由国家拨给。1978 年 1 月,连云港建港指挥部正式向国家计委和交通部编报了关于拦海大堤和 10 万吨级煤炭专用码头的设计任务书;编报了庙岭煤码头的修改设计书。同年 4 月 14 日,由江苏省和交通部联合签发的《关于连云港港口建设规划的报告》上报国务院。

报告对于连云港港口建设提出分二期工程的设想。即第一期工程从 1978 年到 1985 年,建成庙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建成的首个万吨级泊位——连云港庙岭煤码头。(摄影:赵鸣)



岭港区 and 拦海大坝;第二期从1986年开始到本世纪末,建成连云港港区,实现规划目标。第一期工程约需资金8亿元。

报告只是报告,但真正落实则需要资金支持。在当时我国的金融体系下,国家要募集8亿资金建设连云港显然是十分吃力的。当时谷牧同志刚刚考察欧洲五国回来,对于如何利用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提出了建议。依据连云港的发展历史和当时国际金融对于我国的扶持情况,配合连云港港口建设和发展,1978年7月11日,交通部向国务院正式上报了《关于邀请荷兰专家(或企业)来华协助建设连云港和治理长江口岸航道的报告》。

报告收到的当天,谷牧同志就在上述报告上签署了同意的意见。正是这个批示使得连云港港口建设开了利用外资的先河。在交通部牵头下,连云港与荷兰技术代表经过三轮谈判,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应交通部邀请,由荷兰运输、水利和公共工程部派出的筑港技术代表团一行5人于1978年8月27日抵达北京,就连云港和整治长江口工程进行现场考察和会晤,于28日、29日进行了两次会谈。8月31日,代表团由北京乘火车至连云港,开始了他们中国之行的第二站。代表团一行参观了老港区和赣榆海头镇,出海察看了外航道和锚地,取海底泥样。在此两天半时间里,我们与荷兰专家就连云港建设中的两国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洽谈,并就下一步港口建设合作中的计划、时间、人员、设备、报价、合作方式等问题交换了看法,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了解。

1978年9月15日下午,李先念副主席、余秋里、康世恩副总理听取了交通部汇报邀请荷兰专家协助建设连云港、整治长江口的谈判情况。领导基本同意交通部的意见,并责成交通部尽快实施。9月23日,经讨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后,交通部正式递交荷兰政府。同年10月30日,荷兰运输水利和公共工程大臣杜英曼复函予以确认。

1978年10月31日至11月11日,以韦斯曼和财团总经理斯蒂赫特为首的7人代表团再次来中国,就连云港建设与长江口整治问题在北京举行了第二轮谈判。会谈的重点是有关签订连云港工程的总体协议和进行勘测、模型实验、规划等具体问题。

1978年11月25日,交通部根据第二次中荷会谈情况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委托荷兰承包连云港的几个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1978年12月5日,谷牧同志签署了同意的意见。

1979年2月13日至3月9日,中荷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关于连云港港口建设的双边谈判。

后来由于我国国民经济建设战略的调整和外汇问题,交通部终止了委托荷兰财团承建连云港项目的谈判,改为自己建设。

连云港与荷兰的建港合作没能履约,后来改为使用日本国际协力基金贷款,这是后话了。在与荷兰谈判的过程中,谷牧同志在国务院负责对外开放,他始终关注、支持连云港港口建设,专门听取了交通部和连云港建港指挥部与荷兰谈判进程的汇报,多次具体批示和讨论我们与荷兰人谈判的情况,核拨了部分外汇支持连云港港口的对外开放,对于连云港港口利用外资倾注了巨大的热忱和心血。这些我们至今历历在目,铭记在心。

五、集资建港破解建设资金瓶颈问题

建设资金一直是困扰连云港发展的核心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连云港港口需要有自己的办法。集资建港可以说是富有连云港地方特色的一个创举。

早在1980年9月,国务院领导同志在新华社动态清样第3437期上《陇海各省有关部门建议合资扩建连云港》一文上就有批示。1980年9月4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谷牧对此亦有批示。内容为:“这件事不简单,计委、进出口委要组织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能办成当然很好。”这一指示可以说揭开了连云港集资建港的序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谷牧同志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分管对外开放工作。1984年,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连云港名列其中。1985年6月6日,交通部在福建厦门召开了沿海开放城市港口发展座谈会。会议还专题研究了《集资建港试行办法》。同年7月4日至20日,根据厦门会议精神,连云港市政府、连云港建港指挥部和连云港港务局组成联合调查组赴河南、安徽、山西、新疆等省进行有关联合开发建设连云港港口的调查研究。回来后,调查组向交通部和江苏省政府汇报了调查情况,并建议在当年的8月



下旬在连云港召开集资建港会议。

1985年10月19日至22日,“七省区联合开发利用连云港座谈会”在连云港举行。这是连云港集资建港过程中富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交通部部长钱永昌、江苏省省长顾秀莲和连云港市市长何仁华均到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与会代表听取了连云港建港指挥部汇报的连云港建港现状和港口规划建设情况,参观了新老港区,审议了《集资建港试行办法》(讨论稿);最后通过了《七省区联合开发利用连云港座谈会会议纪要》。河南、甘肃、陕西、安徽、青海和新疆等7个省区均就集资建港的具体计划达成了意向,并在会议不久分别在连云港设立了办事机构。

在座谈会之后的三年中,交通部计划局在连云港连续三次召开了集资建设连云港协调小组会议,力推连云港集资建港事宜,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加快了港口发展,缓解了港口建设的资金压力。

1988年4月以后,谷牧同志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经济委员会主任。同年11月7日,谷牧同志再次来到他曾经工作和关心支持的地方视察。我当时是连云港港务局党委书记,有幸再次接待这位尊敬的老领导,亲自向他汇报连云港港口这十几年取得的建设成就和集资建港问题。在庙岭煤码头,我们指着已经被开掉的庙岭山,回忆谷老多年前与彭冲同志一起视察连云港指点连云港港口建设的起航情景。谷老详细询问了庙岭煤码头煤炭从哪里来,往哪里运,煤炭出口能力有多大,使用日本协力基金贷款有多少项目,金额是多少等等,他还认真的询问陇海腹地各省市集资建港事宜,我们一一做了汇报。

在连云港期间,谷老一直关心连云港集资建港进展情况。9日下午,我们再次向谷老汇报港口集资建港问题和未来建设规划。谷老在认真听取汇报后关切地说:“我来连云港多次了,我看内地积极性是可以的,非来不可,但政策、做法不落实,还是落空。连云港发展起来,神气起来了,大家尊重你们。但要统一管理,到时候(指内陆省区集资建成的泊位)就跑不了啦。连云港是很大一篇文章,就是调动内地积极性。你们要把内地各个省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最后临行前,谷老满怀激情地鼓励说:“港口前

天看了,新港口(指庙岭新港区)工程还未清理完,规模比老港口大得多。将来西大堤搞成,港口里可以摆几十个泊位。在全国我还未看到像你们这样摆得满满的。在国内,将来你们这里泊位密度可以算是最高的一个。”他还进一步指出:“将来港口发展和铁路运输适不适应?要充分利用陇海铁路,东面找出海口,西面新疆几个口岸也对外开放,和苏联做生意。形势摆在这,叫大陆桥也好,不叫大陆桥也好,这个线唯一出海口是连云港,那一头是南疆、苏联。不要看暂时发展还不是很快,规模不是很大,我看将来这里很有前途的,摆在那,因为这里地理位置很重要。连云港是我国沿海中部不冻港,防风条件也很好,沿路各省积极性调动起来,这里大有作为。”

结语

翻开连云港建港历史的记录,重温谷牧同志对连云港港口建设的关心和指示,连云港在追寻东方大港之梦的道路上不断创业,不断建设,不断奋进,不断开辟新天地。我作为江苏省省级机关的下放干部,是1973年调职到连云港参与港指挥部工作,后来又一直工作在港口建设第一线,今过程的亲历了连云港港20多年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要事件和节点,多次直接或参与接待谷牧同志,直接向他老人家汇报建港的具体工作,聆听谷牧同志的具体指示,学习他对连云港建港工作的具体批示,深切感受到谷牧同志对连云港港建设的关切情感和严谨科学的态度。文章中的许多内容均为我的亲历和当时的记录。现在回忆起来依然是那样的亲切实在,如声在耳。2013年是连云港港口开港100周年,2014年是谷牧同志诞辰100周年,历史的机缘使我们特别思念指引连云港港口发展的老领导谷牧同志,特别难忘谷牧同志对于连云港港口建设的谆谆教诲和倾力支持。因此,特整理以上回忆,以致谷牧同志的深深敬意和缅怀之情。

(作者赵泳,原连云港港务局党委书记)

责任编辑 邱仕明



铁骨丹心 侠女情

——张琼英的革命生涯

孙苏林

我已入耄耋之年，有许多往事已记忆不清，惟有我三叔孙若溪的夫人张琼英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1934年，在我12岁的时候，三婶张琼英（当时用名陈冰声）来到我家，在三叔创办的孙家渡小学教书两年多。三婶中等个子，长方脸，齐肩短发，蓝布旗袍上常套一件褐色毛衣，讲一口流利的四川国语，人们都尊称她陈先生。她待人和气，讲课认真，学生们都很喜欢她。

1969年秋，三叔和张琼英的儿子陈继烈（原名孙复申）从成都来灌云认祖，带来了许多革命史料，让我对她的一生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李大钊动员她参加共产党

1903年，张琼英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代市镇的一个农民家庭，上有一个哥哥，四个姐姐。她天资聪颖，学习认真，成绩优秀。17岁时，在县劝学所举办的中学招生考试中名列前茅，被录取为官费生。1921年，她和蒲振声、郑育才、赵世兰等同学一起，进入设在成都的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她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反封建、反军阀游行示威等社会活动。学校成立学生自治会时，张琼英被推选为纠察队负责人。为要求日本归还旅顺、大连租界，学生会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张琼英积极参与，成为小有名气的活动分子。

1926年，张琼英和同学蒲振声、赵世兰以优异成绩被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录取为官费生。受到新思想的启迪与鼓舞，她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逐步成为组织班级活动的骨干分子。

这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赵世兰、蒲振声向张琼英讲解马克思主义，动员她入党。张琼英怕入党影响学习，当时没有表明态度。

一天，赵世兰、蒲振声把张琼英带到李大钊教授面前。李大钊对张琼英说：“学生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是爱国进步的表现。加入共产党便负有解放全中国和解放全人类的光荣使命，只有中国共产党推翻旧社会，才能解救苦难的中国……”张琼英平时就非常敬佩李大钊教授，现亲聆教诲，顿觉心明眼亮，认识到过去虽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但目光短浅。于是由赵世兰、彭莲清介绍，于1927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谈话，恢复她的党籍

张琼英入党后，一边读书，一边为党工作。1927年夏天，中共北平市委调张琼英到市委机关，负责保管文件、经费、为领导传送密件等工作。一天，地下交通员紧急通知张琼英，市委机关有人被捕，赶快销毁文件。张琼英刚把烧过的文件纸灰倒进水沟里，敌人就冲进屋里进行搜查。虽未搜到证据，但张琼英等五个人还是被捕了。

张琼英被关一个多月后，由一名女同学的父亲保释出狱。出狱后，在王希哲建议下，她转移去上海。1928年春，张琼英在上海找到了中共中央机关，见到了赵世兰、彭莲清、蒲振声、胡伦等同志。由于张琼英曾入狱一个多月，他们便让张琼英写一个申请恢复党籍的报告，由赵世兰呈送中央。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长的邓小平找张琼



莫谈话说：“有关领导研究了你的报告，决定恢复你的党籍，留在中央机关工作，负责保管文件、密写等，并兼管向领导送文件。”

1928年，张琼英与赵世兰、蒲振声、彭萍清等人一起，由中央选派去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进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不久，学校便举行了二十多天的两条路线论争会。这场论争在共大持续了大半年时间。张琼英在会上深刻揭露了王明等人的论调。学习结束时，张琼英被诬附和托派反党，清党委员会开除她的党籍。张琼英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但她决不屈服。

周恩来证明她没有问题

共大风波传到上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来到莫斯科解决矛盾，张琼英请周恩来对她过去的工作写个证明。周恩来即写了个条子说：“张琼英同志在中央工作那段时间，没有发现问题。”

1931年，张琼英从共大结业。回到上海后，中央仍要她在机关工作，但她认为自己党籍没有恢复，要求到基层工厂去参加劳动。经领导同意，由中共江苏省委分配她到吴淞区永安第二纱厂当工人，并明确在中共吴淞区委领导下做工人工作。区委决定张琼英与区委宣传委员孙若溪单线联系，不久，两人结为革命伴侣。

1931年底，厂方召开工人代表会，决定“年关资本家分红，工人不分红”。张琼英立即在工人中发动罢工斗争。资本家雇佣军队开枪镇压，当场死伤20余人。张琼英组织人员将伤员送进医院救治，并组织纠察队护厂，还印刷传单到附近工厂散发，得到多方声援。

张琼英始终站在领导斗争的最前线，实践证明张琼英是位坚定的革命者，上级党组织便正式恢复了她的党籍。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江苏省委调她到虹口丝厂搞罢工斗争。1932年调任沪东、闸北区委委员，分管妇女工作。在此期间，她还积极参加了援救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运动。

学生崇拜的好老师

1932年夏，在上海地下党筹备纪念“四·一二”和“五一”大游行活动中，孙若溪和张琼英先后被捕。孙若溪被关三个月后无罪释放。出狱后，孙若溪找律师为张琼英辩护，最后法院以“农村妇女被利用，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

1933年夏，孙若溪回老家治丧。他见家乡儿童

无处上学，便与灌云县教育科联系，在自家的七间屋基地上，创办孙家渡初级小学校，于1935年上半年正式招生。由孙若溪任校长，厉国桢、侍民、冯树池、潘峰昌、孙万长等任教师。同年秋，张琼英刑满出狱，孙若溪将她接到灌云，暂时安排在孙家渡小学教书。

张琼英讲课认真，深入浅出，学生们听得懂，理解深，都很尊敬她。当时，学校还附设一个初中班，她在为中学生讲课时，联系社会现实，宣传进步思想。除在本校授课外，张琼英还应邀去潘洋小学、厉荡小学为高年级讲授语文课。

1937年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在镇江举办区长训练班，登报招生。张琼英得知后与上海党组织联系后，要求孙若溪、厉国桢去报考，争取打入国民党地方政权，便于开展革命活动。孙若溪考取后，即把已经怀孕临产的张琼英送到上海后赴镇江学习。

战斗在抗日斗争第一线

1937年，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形势紧迫。镇江的区长训练班停办。根据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要求，孙若溪于8月底回到灌云，开展抗日宣传、组建抗日武装。不久，孙若溪接到张琼英来信，告知她在红十字医院生一男孩，取名孙复申（取原被封闭的上海进步报纸《申报》待时复刊之意），要他去上海看孩子。孙若溪因在灌云西乡刚打开工作局面，无法脱身，便给张琼英汇了两次款，并写信向她说明情况。

当年11月初上海失守，12月底南京失守，长江被日寇全线封锁，带着婴儿的张琼英被上海地下党转移到浙江农村。因南北交通断绝，张琼英和孙若溪失去联系，八年音信杳无。

张琼英撤到浙江后不久，组织关系转归中央特委负责人高原领导。高原派张琼英到昆山支队工作，张琼英忍痛将幼小的孙复申送进上海南边的难民收容所托人代管，自己则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武装斗争。

昆山支队原由国民党两个区队改编组建，领导人是旧军官刘化南。不久，张琼英得到情报，刘化南要带着部队投降日寇，情况十分危急。张琼英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特委。特委便以开会名义将刘化南调到上海，另派陶一球任支队长，任命张琼英为政治部主任，兼管文件、经费。约经一年，这支部



队编入新四军三支队,张琼英调到地方,中共东路特委分配她做妇女工作。几个月后奉调到盐城新华、阜东,以工作队名义协助地方政权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

坚持边区斗争的好书记

1943年秋,张琼英调任滨海县二、三区委副书记,后又调任四区区委书记。在极为尖锐复杂的边区斗争中,张琼英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打击日伪军和土匪恶霸的猖狂进攻,处决一个屡次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恶霸,广大干部群众拍手称快,一致赞扬张琼英是“包青天”。

1944年,张琼英在参加中共盐阜地委整风队学习时,得知丈夫孙若溪正在淮海地委整风队学习,便随部队来到淮海整风队见到了孙若溪。因音信断绝八年,孙若溪已于三年前重组家庭。时处整风期间,作为中共淮云县委敌工部长的孙若溪进退两难,若离婚、再结婚,在个人问题上掀起大风大浪,对自己的人格和工作都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双方在夫妻关系问题上,只能是旧梦难圆。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琼英担任中共滨海县委委员,分管妇女工作。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滨海县的斗争环境极为恶劣,特别是十套区,海匪、流亡队甚多,形势更为紧张。中共滨海县委决定调张琼英到十套区担任区委书记。她带领区委、区署和区队七十多位民兵,日夜与敌人周旋。她灵活运用游击战术,痛击来犯之敌,胜利坚持到地区解放。县委书记熊宇忠问她:“你是一位女同志,怎么能有这么大的胆呢?”张琼英说:“为了胜利,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一支步枪,六颗子弹,消灭敌人,保护自己,我已习惯了紧张的战斗生活。”

1948年底,张琼英调任中共华东工委妇女委员,为正县级。1949年3月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妇联代表大会。10月,调任苏南区党委无锡市委妇女委员。

建设大西南的排头兵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干部进军大西南,开展新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工作。张琼英调任四川江津专区妇联主任、地委妇委副书记。

1959年8月,张琼英被调到国家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先后担任女工部长、武装部副部长。这个工程局拥有六万多工人,全国各地都有工地。张琼英是个工作责任心极强的人,经常到各地去检查指导

工作。她一直没有重新组建家庭,儿子陈继烈(原名孙复申)在北京航空第四研究所工作,不在身边,她总是一个人过着紧张忙碌的生活。

由于张琼英有过被捕入狱的经历,“文革”中被造反派扣上了“叛徒”的罪名,进行批斗、拷打,并关进监狱。被关八个月后,因患重病,造反派只得批准她出去治疗。她乘机到北京儿子处,刚到儿子家半个月,成都的造反派就追到了北京。在第四研究所院中贴出大字报,要研究所交出“叛徒”张琼英,但张琼英坚决不承认。儿子急了,对母亲说:“你光说自己不是叛徒不行,需要有人证明。”张琼英说:“有人能证明我清白,但涉及中央领导人,说了别人也不信,反而更受罪。”在儿子再三要求下,她说:“周恩来总理了解我,但我永远也见不到他。”陈继烈便为母亲写了一封信,寄给总理办公室。约有半个月时间,两位军队干部来到第四研究所,在办公室找张琼英谈话说:“你写给周总理的信,总理看到了,他还记得你。你在中央机关管理文件很好,是在街头宣传时被捕的,被判刑出狱的,没有什么问题。总理要我们告诉你,你还是回成都去,在外面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要听总理的话,以后成都的工作由我们做。”张琼英只好回了成都,造反派也没再找她的麻烦。

1973年,铁二局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为张琼英召开了隆重的平反大会,恢复名誉。这时她虽已年届七十,但仍经常到各个建筑工地上去察看。一次,在贵阳工地上突发脑溢血,在贵阳市人民医院治疗半年。回到成都后,她又跌了一跤,导致右股骨骨折,生活不能自理。铁二局领导考虑到张琼英身边无亲属,便设法将她的儿子、儿媳调到铁二局工作,让她家人团聚。1988年8月4日,张琼英因脑溢血,经抢救无效辞世,享年85岁。

张琼英逝世后,铁二局召开了极为隆重的追悼大会,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川等地数十个单位领导人亲自来悼念这位有着62年党龄的革命前辈。铁二局党委在悼词中对她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灵堂挽联精辟概括了她的人生品格:鞠躬尽瘁,壮心不已;名利无缘,勤奋一生。她是一位真正的巾帼英雄,她那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责任编辑 邱仕明



求真务实的老报人

——和杜庚同志相处的那些往事

张学贤



杜庚

在我书房里，挂有连云港日报社老总编、著名书法家杜庚同志赠送的一块横匾，上面书写着“求实”两个大字。这是杜老终生追求的理念，每当抬头看到这两个大字时，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和他相处的那些往事。

一、踏上新闻岗位的指路人

1950年2月，我海州师范毕业后留校工作。1955年10月，我被市委组织部借调到文教肃反办

公室，工作地点就在建国路老市委机关大院。

1956年元旦那天，我正在海州家中休假。下午四时许，海师工友小韩同志急匆匆地跑到我家，说市委来电话，邰华民校长要我尽快回学校。我赶到学校时，太阳已快落山，邰校长说：“市委组织部决定调你到市委宣传部工作，今天晚上就去报到，宣传部杜秘书在办公室等你。”

当时，海州到新浦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马车。天色已晚，赶马车的师傅已回家休息，我只好摸黑步行，一个多小时后赶到新浦机关大院，发现宣传部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喊：“杜秘书在吗？”只见一位中年人站起身来，微笑着对我说：“我是杜庚，你是海师张学贤同志吗？由于任务太急，让你摸黑赶来，实在对不起。”让座之后他慢声细语地告诉我：“宣传部原来有一位通讯干事，名叫谢中学，也是你们海师毕业的，由于工作变动，明天就要去上海中央党校华东分校学习，宣传部张绍云部长和市委组织部商量，决定调你来接任通讯干事，正好新华日报社通知明天要开会，所以就匆匆忙忙叫你来了。”接着又说，“怕你时间来不及，今天下午我替你写好开会介绍信，借了差旅费，买了火车票，明天早晨五时前赶到新浦火车站就行了。”待杜庚秘书一切交代完毕，已是晚八时整，他把我送出机关大院才回家吃晚饭。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杜庚同志，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工作细心、待人诚恳、语言温和、责任心很强，是



一位值得信赖的好兄长。

参加新华日报社会议回来后,我即投入通讯报道工作。开头个把月,采写几篇稿子,都没有被利用。杜庚同志怕我失去信心,有一天约我到海州洪门果园看看。在场长办公室,他细致地询问果园的发展历史,古安梨的特色和增产措施,要我详细记录,而后又和正在浇水施肥的园工交谈。由于素材丰富,又有亲身感受,很快写出《海州洪门果园古安梨,今年可望大丰收》稿子,不几天就在《新华日报》二版刊登出来,这是我走上新闻岗位被省报采用的第一篇稿子。如果没有杜庚同志的具体指导,可能还要苦苦地摸索下去。为了打开工业报道的局面,杜庚同志建议我找两个对全市工业生产情况熟悉的人交朋友,便于采写稿件。

正在我聚精会神做好通讯报道工作时,部里又给我增加一项任务。当年六月初,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绍云同志在部务会上决定办工作简报,他交代这个任务由我兼搞,由杜庚同志负责把关审稿。我当时担心通讯报道搞不好,简报也办不起来,两项任务都搞砸了。杜庚同志看出我的情绪,主动和我谈心,还和我加班两个晚上,拟定一个简单方案。他特别强调办简报和办报纸都是给领导和读者看的,一定要讲真话、说真事,不能有半点虚假。

经过半个月的努力,由杜庚同志撰写报名的《新海连简报》,于1956年7月底问世了,虽然版面编排水平、稿件质量都不怎么样,还是受到领导和同志们欢迎,来稿数量不断增加,每期印刷份数也在不断刷新。

这是我和杜庚同志第一次共事,由于得到他的热忱相助、精心指导,较好地完成了组织交代的任务,也增强了我搞好新闻工作的信心。

二、共同创办市报 从他身上学到许多好作风

1958年1月6日至2月14日,市委召开一届二次全会。会议结束第二天,宣传部长张绍云同志兴高采烈地向部里传达了市委同意创办机关报的决定,并要求大家勤俭创业,用革命精神在3月1日拿出第一期市报。

报社地点选在建国路上的一个小院子里,内有一座两层小楼和几间草房。开始由市委文教部副部长王永祚同志坐镇指挥。中间又调换杜庚同志全权负责。

杜庚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曾两次在报社工作,这次到职后,很快确定版面设计、人员分工和近期报道提示,突击发展第一批通讯员,并和新海印刷厂、邮局签订印刷、发行协议。经过两期试刊,于当年3月1日《新海连市报》正式创刊,开始为周二刊,四开四版,发行量仅有3000份(包括赠阅部分)。当年5月1日,根据市委决定,改名为《新海连日报》,仍为四开四版,发行量增至4000份。

从1958年2月参加创刊到1960年4月调市委办公室任新闻秘书,我在新海连日报社工作了两年零两个月。在这短暂的日子里,我和杜庚同志朝夕相处、并肩战斗,不仅革命友谊更加深厚,还从他身上学到许多好思想好作风。

一是严于律己,带头过艰苦日子。当时机关工作条件都很差,报社是临时突击搞起来的,条件就更差了。房子透风、楼板裂缝,用的都是旧桌、旧椅、旧板凳,夏天没有电风扇,靠自带的芭蕉扇降温,冬天五六个人靠一个旧煤炉取暖,用的是劣质煤,一天要燎火两三次。在新浦地区采访,靠两条腿步行,到海州、云台地区采访,配一辆旧自行车。

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杜庚同志反复倡导勤俭、艰苦奋斗精神,带头和大家一道过苦日子。在他狭小的办公室里,仅有一张旧桌、一把旧椅、一个从宣传部带来的竹壳水瓶,外加一张值夜班用的木床,被褥还是自带的,没有别的摆设。他早上班、识下班,假日很少休息,在老母亲病重做手术期间也不敢擅离岗位。在杜庚同志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大家团结一心,开拓创新,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保证按时出报,完成党的重任。

二是坚决维护新闻的真实性。从创刊一开始,杜庚同志就反复强调新闻的真实性。他告诫大家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如果道听途说,弄虚作假,损害个人名誉事小,危害党报的声誉事大,希望每个编辑、记者都能自觉地维护新闻的真实性。

当时有几件事给我很深的印象。创刊初期,有位青年记者(部队转业)借口报社催稿太急,采访时不深入调查,不认真核实,几次出现失实报道,读者反映到报社。杜庚同志找其谈话,并在小组会上开展批评帮助。该同志对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帮助不以为然,杜庚同志又在编辑部大会上点名批评,分析危害。杜庚同志指出: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是记者



应有的品质。他要求每个编辑、记者做人要诚实、做事要扎实、写文章要真实。经过严肃认真的批评帮助,这位青年记者深受感动,采访作风有所转变,事后写出不少有深度的报道。杜庚同志“三个实”的要求,我一直牢记在心,成为人生的座右铭。

195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同志一行来连云港视察。事前,市委领导要求杜庚同志作好采访准备,在市报上隆重宣传这件大事。但刘主席在连时间短暂(凌晨2时30分到达,当天下午1时许即离开),仅在专列上会见省委、驻军和市委主要负责人,杜庚同志没有机会见面,更谈不上现场采访,最后只能根据市委书记冯克玉口头介绍的情况撰写文稿。经过两天突击,写出《刘少奇副主席在新海连》的长篇报道,他反复对照冯书记介绍的笔记,还不放心,后来又要我和他一道核对、推敲。经冯书记审查后公开见报,给全市人民带来极大的鼓舞。但杜庚同志却提心吊胆地度过多个不眠之夜,担心没有到现场采访,万一出现失误无法向党和读者交代。

三是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杜庚同志不仅能够坚持原则,对错误思想作风敢于开展批评,同时又勇于自我批评,承担责任,从不上推下卸。

大约在1958年秋,省委宣传部根据新海连市委要求,和新华日报社协商,抽调经济组副组长袁汀同志到新海连日报社担任副总编(排在杜庚同志之后)。袁汀同志新闻理论、业务水平都很高,受到同志们的敬重。但相处一段时间,发现他言语散漫,经常在大家面前叫苦,直接干扰了同志们的工作情绪。杜庚同志理解他们夫妇在大城市生活惯了,乍到苏北不适应,除了提醒袁汀同志注意群众影响,并尽可能地作一些努力,如请机关食堂中午、晚上增加米饭供应,购置一只大木桶,安排工人烧开水让他们夫妇在家洗澡。但袁汀同志还是不满意,继续叫苦连天。后来报社有的同志看不惯,反映到市委,市委书记责令杜庚同志严肃批评,不要因为他一个人而动摇军心。市委让兼任报社总编的谭学宏同志(长期未到职)回报社和杜庚同志一道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商量,决定召开支部扩大会议(除三个支委,我和罗常洲同志以党小组长身份参加),批评袁汀同志的错误,会议连续开了三个晚上,杜庚同志首先检讨自己对袁汀同志生活上没有很好照顾,同

时又严肃批评了袁汀同志不顾群众影响,随意叫苦,动摇军心的错误。整风反右刚刚结束,大家发言时上纲上线在所难免,袁汀同志被批得额头冒汗,最后勉强承认错误,但要求市委照顾,让他们夫妇调回江南。

事隔多年,每提到此事,杜庚同志都首先检讨自己只顾忙于工作,没能及时帮助袁汀同志解决实际困难,以致没有留住一位业务熟练、领导经验丰富的老报人,是市报一大损失,为此深感内疚。

三、复刊时又给我留下三点指教

在十年浩劫中,杜庚同志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先是“靠边站”,而后又下放到基层,直到1981年6月才调回机关,担任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1987年离休。

1979年1月,市委决定《连云港日报》复刊(文革中期停刊),调我回报社主持复刊工作。我曾拜访、请教老总编杜庚同志。在交谈中他除了热情地祝贺我走上新岗位,还联系自己的经历,谈了一些体会。他说: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清规戒律少了,报纸好办了,但是,不论怎样解放思想,不能让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情调占上风;不论工作怎样忙,条件怎样差,都要关心职工生活,尽力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报社留得住人才;不论怎样搞活版面,也不能让虚假报道、失实新闻充斥报端。对这几条指教,杜庚同志既有亲身感受,也有切肤之痛,我一直铭记在心,认真践行。

杜庚同志在离休前后,一直活跃在文化舞台上,长期担任市书协的会长,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写下了难以计数的牌匾、横幅和中堂。为传承杜庚同志的书法艺术,在市人大常委会的支持下,由原连云港电视大学副校长陈振伦同志担任主编,于2009年11月正式编印出版《杜庚书法集》,全面展示了杜庚同志在书法艺术上的辉煌成就。

由于文革的冲击,身心遭受严重伤害,杜庚同志进入晚年,身体状况日渐衰退,2011年1月31日不幸逝世,享年90岁。

(作者单位:市委统战部)

责任编辑 张伟敏



一桥贯欧亚 电波传五洲

——新亚欧大陆桥开通前后外宣工作二三事

赵 鸣



亚欧铁路大陆桥示意图

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要与欧亚各国创新合作模式，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江苏省连云港代表团与哈萨克斯坦政府国有铁路股份公司签署了交通合作协议，两国元首见证了协议签署，新亚欧大陆桥运输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14年5月19日晚7点28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上海西郊宾馆国际会议中心共同推动了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项目的启动装置，这标志着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首个中外合作项目正式启动。作为海陆丝绸之路的交汇枢纽，连云港再次成为公众聚焦的视点。

新亚欧大陆桥建设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

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重要的跨越欧亚的陆域经济走廊，也是我国连接中亚的唯一陆域通路，被称为“第二条亚欧大陆桥”或“新丝绸之路”。回首22年前，新亚欧大陆桥建设刚刚起步，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交通的对外开放度，形成立体式的、双向的对外开放格局，国家交通部提出了建设新亚欧大陆桥的战略构想。当时，我任连云港市委外宣办副主任，负责对外宣传，因工作需要，全面介入了大陆桥开通前后的宣传推介工作，见证了新亚欧大陆桥开通的全过程。

记得那时刚刚开始介入大陆桥宣传工作，对于大陆桥是什么，一直很模糊。只知道第一条大陆桥在美洲，是横穿美国的铁路；第二条是西伯利亚大陆桥，从海参崴经西伯利亚至欧洲；从连云港始发



的大陆桥是世界上第三条。由于位于欧亚大陆,继西伯利亚大陆桥之后,因此,被称为“新亚欧大陆桥”。它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全长10900公里,横贯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11个省区和中亚、欧洲7国。这个区域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3,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连云港也被誉为东方桥头堡。为了应对媒体采访,我研读了当时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徐淑芬研究员的有关报告,全面了解了大陆桥概念和具体内容,对什么是新亚欧大陆桥,如何介绍新亚欧大陆桥有了一个总体的认识 and 把握,为那时的新大陆桥宣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来采访的记者特别多,我先后接待过100多家新闻媒体,主要有新华社、中新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经济日报社等,以及香港、台湾地区和美联社、俄罗斯通讯社、西班牙埃菲社、日本NHK、韩国KBS等海内外媒体。由于大陆桥是一条国际大通道,所以系列报道形式特别多。我记得最早在国内系列报道新亚欧大陆桥的是《人民铁道报》。当时,新亚欧大陆桥还未全线开通,《人民铁道报》驻济南记者站首席记者罗朝清和机动记者杨建波准备徒步穿行新亚欧大陆桥国内段的所有城市。1991年11月1日11点零1分,他们从陇海铁路零公里处起步启程,开始横穿中国4000多公里的采访路程。该距离新亚欧大陆桥首列开通还有13个月。此次采访历时7个月,于次年5月抵达大陆桥国内段的西端阿拉山口。1996年8月11-15日,我接待了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新亚欧大陆桥纪行》摄制组。这是我国媒体第一个采取跨国界电视报道形式宣传新亚欧大陆桥的摄制组。那时的大陆桥已经有了一些影响。他们一来就问大陆桥在哪里?桥头堡是什么样子?作为电视记者,报道需要出图像,

对于大陆桥这个概念还不太了解。在他们的想象中,既然是大陆桥和桥头堡,肯定是有有一个固定形象,比如长长的桥体、高耸入云的桥头堡、繁忙的来往车辆等画面。我对他们解释了大陆桥概念,说明了大陆桥只是一种集装箱的运输方式。这里的桥是一种门到门的运输概念和服务形式,而不是传统概念上的桥。连云港是新亚欧大陆桥的运输起点和海陆集疏运的中转站。采访组组长赵树青是个工作责任心极强的记者,很快就把握了大陆桥宣传的主要脉络,选择了连云港西大堤入口处作为这次《纪行》采访的起点。12日清晨,拂面的海风给采访增添了浓浓夏意。任永蔚作为出镜记者,站在西大堤上,向世人报道了连云港的建设情况。大陆桥运输现状,以及通过陆桥加强与中西部合作,双向对外开放的广阔发展前景。此次报道从江苏连云港开始,途经徐州、郑州、兰州、乌鲁木齐等国内城市,横穿欧亚,还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波兰、德国、荷兰等国,最终以鹿特丹港为终点,全面介绍了新亚欧大陆桥开通后各国的大陆桥运营状况,总计30集。央视的系列报道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外的新亚欧大陆桥宣传热,之后国内的新华社、《今日中国》杂志、《国际商报》等传媒和海外的韩国KBS、日本的NHK、《今日日本》杂志等均以系列报道形式开展宣



1992年12月1日新亚欧大陆桥开通时的大陆桥起点标志



传,提升了新亚欧大陆桥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兴起了新一轮的新大陆桥采访热。

在新亚欧大陆桥宣传中,有一个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在当时的对外宣传中,一些中央对外媒体宣传连云港市作为东方桥头堡时,一般均翻译成“EASTERN HEADBRIDGE”。给海外记者来连云港采访以误导。在1992年9月新亚欧大陆桥开通前夕,连云港市在港口设立了一个新亚欧大陆桥的起点标志。它上面是铁锚、铁轨,下面是基座。基座前面刻有“新亚欧大桥东方桥头堡”,背面刻有英文翻译。标志作为新亚欧大陆桥唯一的地理标识,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关注,也是媒体必到的焦点所在。当时的设计和制作任务就落在我肩上。标志的铁锚、铁轨和方形基座寓意着大陆桥的集装箱海陆联运,体现了大陆桥运输的基本概念,这一点没有太多异议。就是这翻译,比较棘手。如果按照字面翻译,肯定会引起外国人的误解。另外翻译必须严谨,不能出错。我从对大陆桥的理解和中西方文化差异等方面进行了梳理,提议采取外国人理解的方式翻译,而不用中国式英语翻译模式按图索骥,将“东方桥头堡”改译成了“东端起点处”。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当时的市长王穆卿和副市长程智培的认可。后来,大陆桥标志改建了几次,由原来的混凝土浇筑变成了内部浇筑和外部大理石贴面的形式,但是,铁锚、铁轨和基座的表现形式和“THE EASTERN TERMINAL”的译文形式,一直延续下来。这个译文现在已经不太引人关注,成为一种通常习惯用法,但在当时还是需要一定勇气和智慧的。用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能看懂的翻译形式,从某种意义上看,在当时对外宣传中还是不太容易的。

新亚欧大陆桥开通距今现在已经20多年了。1990年9月1日,我国的兰新铁路西段与俄罗斯的土西铁路接轨,标志着新亚欧大陆桥全线贯通。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正在新疆视察,并亲自为接轨仪式剪彩。那时的新亚欧大陆桥刚刚形成运输能力,规模化的运输还未真正开始。直至1992年12月1日连云港过境集装箱运输专列的开通,新亚欧大陆桥才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为了准备大陆桥首列集装箱专列的始发仪式,连云港市邀请了大批记者来连采访。当时,图像采访稿的发送不太方便,电视记者需要将采访完的素材编辑好,然后通过连云港市电视台发至江苏省电视台,再由省电视台在每天规定的时段内发至中央电视台。即时传输、网络传输还不便捷,所有输送线路受到时间和路径的限制。图片拍摄全部是胶片,需要拍摄、冲洗后,才能发送,且地方没有此类设备。当时图片发送是极为困难的,不像今天用E-MAIL,轻轻一点就过去了。新华社派了资深记者杨福田同志来连采访。他负责写文稿,不搞摄影。因此,发送图片的任务又落在我的身上。我当时负责活动过程中国内外近60人的新闻记者采访、接待、安排任务,同时还肩负新华社摄影的发稿任务,倍感压力。

11月30日上午8点,晨雾还未散去,连云港集装箱码头上已经人声鼎沸,熙熙攘攘。我赶到了发车现场,安排好记者后,就立即仔细查看地形,选择好拍摄的最佳角度。上午10点,码头空地上的鞭炮、码头停泊的船只汽笛齐鸣,时任国务院经贸办副局长夏元卿、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刘国夫、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蒋田杰和连云港市委书记秦兆桢等共同为首列开通仪式剪彩。次日凌晨1点35分满载着首批50个集装箱的7824次国际集装箱专列从连云港集装箱码头出发,踏上了新亚欧大陆桥的行程。新亚欧大陆桥首列运输在大陆桥运输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从日本起运,途径中国连云港,穿越我国东中西的11个省区,经阿拉山口进入哈萨克斯坦中亚地区,真正实现了跨国的海陆联运。

新亚欧大陆桥首列过境集装箱班列开通是一个极具新闻性的重大事件。新华社要发通稿,而那时的新华社只有很少的图片传真机,一般放在省会城市,内部规定每天每个分社只能在一定时间内传输,当时只有让位给其他分社。新华社南京分社传输的时间是下午5点。大陆桥首列运输是10点半左右结束的。我就立即开车去新浦冲洗照片。仪式举行的当天12点前,一张新亚欧大陆桥开通剪彩





1998年参加北京新亚欧大陆桥会议代表在大陆桥起点处合影。摄影：赵鸣

仪式的图片放大完毕，送到了杨福田同志手中。中午他匆匆吃完饭返回南京，确保在5点之前将图片发送到北京总社。新华社总社连夜将开通仪式的图片发往世界各地的各个客户端。第二天早上，这张反映首列开通仪式的图片见诸国内外报端。《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欧洲时报》、《美国侨报》等海内外纸质媒体均在头版头条刊登新亚欧大陆桥首列开通的消息和图片，这为新亚欧大陆桥对外宣传绘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建设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1994年，国务院总理李鹏从中亚出访归来后，又专门到连云港视察大陆桥运输情况，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巍巍天山皑皑雪，漫漫古道滚滚沙，一桥如虹贯欧亚，丝绸之路绽新花。”他站在新亚欧大陆桥桥头堡标志处挥手向世界推介了大陆桥。1995年9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和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利用连云港装卸和运输哈萨克斯坦过境货物的协议》，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哈萨克斯坦总统扎尔巴耶夫出席了签字仪式。1995年11月23日，从美国运往乌兹别克斯坦的集装箱整列从连云港上桥，标志着新亚欧大陆桥跨洲际、大运力、全程化运输时代的到来。1996

年5月7-9日，国家科委、计委和外经贸部共同组织召开了新亚欧大陆桥区域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以及15个国际组织的400多名代表，共同商讨如何充分利用这条现代丝绸之路，加速亚欧两大洲的区域经济合作和开发。会后，约200多名参会代表乘专机来连云港实地考察。同年7月3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乌兹别克斯

坦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四项文件，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铁路合作协定》，对新亚欧大陆桥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后来，新亚欧大陆桥运输日趋正常化，大陆桥新闻宣传也渐渐步入佳境。几乎所有的国内主流媒体和主要外国媒体都积极跟进，参与了这条经济带的新闻宣传，较好地呼应我国的对外开放，也极大地提升了连云港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连云港蜚声海内外。2000年12月，我将收集的近20个国家的100多个新闻媒体刊播的1万篇稿件进行筛选，选出了500字以上的300多篇稿件，特别是当时关于新亚欧大陆桥报道的文稿，汇编成册，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走向世界的连云港》。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积极参与大陆桥宣传，服务我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新亚欧大陆桥对外宣传的起步和发展，引以自豪，终生难忘。

（作者单位：市文广新局）

责任编辑 张伟敏



志“凡例”编写存在的 书问题及改进方法

——以连云港市县区志为例

陆瑞萍

“凡例”，是方志的传统文体，也是新编地方志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例是编纂者对志书指导思想、编纂原则、时空范围、体裁、人物收录标准、资料来源、行文规范、特殊问题处理等作出统一规定和理论说明的条例。凡例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志书的编写起指导和制约作用。对修志人员来说，凡例是编纂志书的总方案。正由于有了凡例，修志人员在工作中才能纲举目张，明体达义，做到取材有依据，编纂有准则，行文有规范。二是可以指导读者更好地阅读志书。一部志书有了周密的凡例，对广大读者来说，就等于有了可遵循的阅读指南，通过凡例可得阅读之要领。

但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凡例中存在的问题较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模糊笼统，千书一面现象较明显

修志的指导思想和编纂原则是普遍相同的，但各地各志的结构和方法却允许有所区别，各有独特的个性和风格。故凡例的着眼点和写法也会有所不

同，每部志书完全可以有别具一格的凡例。制订凡例，应抓住重点，突出特色，有所创新。凡历代相因，且至今没有疑义的传统体例，一般情况下点到即可。凡全国的统一规定，各地约定俗成的基本原则，可以尽量简化叙述。尤其需要突出本志的重点和特色、编者认识有分歧读者理解有异义的取材原则和编纂方法等，做到“例由义起”。

《海州区志》凡例

一、本志为1999年版《海州区志》（简称前志）的续志，记载上限起于海州区恢复建制的1986年，下限止于2005年。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力求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述新限内海州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此条交代志书名称、上下限和志书遵循的指导思想，可一分为二）

二、本志按照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相结合的原则，共设三十六编。编下设章、节、目。志首设地



图、照片、序、凡例、目录、总述、大事记、专记附有关编末。志末设附录、编后记和二级主题及表格索引。(此条介绍志书结构)

三、为保持本志记述历史的连续性,在编及章下设序,扼要纵述断限前的历史,追溯事项的发端,展示发展及现状轮廓,贯通古今,实现与前志的衔接,铺垫下文。《大事记》《古城海州》《宗教》《人物》等编从事项发端写起;前志已载的基本地情等项,本志酌情复载或简载;前志漏载的某些事项,补载之;照片和大事记下限延至2012年。(此条介绍与前志的衔接方法和某些突破志书上下限的特例)

四、本志体裁以志为主,兼用述、记、传、图、表、录。节以下行文运用记述文体,横排纵述。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此条介绍志书体裁)

五、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朝代纪年,并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成立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此条介绍纪年方法)

六、本志记述机构、单位等名称,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并加简称括注。记载人物,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主要收录对海州历史发展有重要贡献或较大影响的人士。人物传略和简介按出生年月排序,烈士按牺牲时间排序,先进模范人物按授予荣誉称号和获奖时间排序。(此条介绍全称简称和人物志收录及排序标准)

七、本志采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记述,使用词语以《现代汉语词典》、新编《辞海》为标准,使用文字以《简化字总表》为标准,标点符号、数字和计量单位使用,以国家标准出版物规定为准。新限内的统计数据,以统计部门正式公布的数据为准;统计部门没有数据的,使用主管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格空白处为未发生、无统计或查无数据。(此条介绍文体及行文规范、统计数据。可分成两条。标点符号、数字和计量,国家标准都有成文规定,可再写具体些)

八、本志资料取自文献、档案、报刊、口述资料和实物,并经鉴别核实。直录自史籍文献者使用明引,引文忠于原作。史籍记载不一又难以考证确定者,诸说并存。(此条介绍资料来源)

九、为方便阅读,本志同步出版全文检索光盘。(此条介绍光盘,新瓶装新酒,是上轮修志所没有的新事物)

《连云区志》凡例

凡例六:本志将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的一部分类目作升格处理,如港口,口岸(港口口岸实际为一编,而不是两编)、文化遗存、民俗方言等升格为编。将海洋资源(包括海洋水)列入“海洋经济”编中记述,以彰显连云区的地域特色(此句前后逻辑不合,海洋资源不管是放在海洋经济编还是放在资源与环境编,都能突出连云区的地域特色)“环境与资源”编中不再记述。

凡例八:本志各编、章下均设无题小序,从不同角度概括引领正文内容。

凡例九:为使续志与前志更好衔接,本志视叙述的具体需要,在有关章节正文后,设“相关链接”,对前志内容作简要追溯。

《新浦区新志》

凡例一:本志为重修区志,为区别于首轮编修的《新浦区志》,定名为《连云港市新浦区新志》。(此条介绍书名由来)

凡例三:本志以2005年底新浦区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对与本区有联系而涉及辖区以外诸事的记述,以说明事物始末为度;对辖区内全市性的事业,本着略市志所详,详市志所略的原则,予以记述,以全面反映辖区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色。(此条交代作为城市区志在资料取舍上的特色)

凡例八:本志重视科学运用首轮编修的《新浦区志》,承其史料,补其欠缺,修其讹误。(此条与凡例一相呼应,不足的是怎样承其史料的,设置补遗勘误,还是正文各部分补充修改?没有写出来)

《赣榆县志》

凡例四:本志记载秉笔直书,述而不作。所记皆实录,不溢美,不扬恶,不讳过。

上述凡例对篇章结构、志体写法、特殊情况如升格和前言、编章下小序、与前志关系处理、简称等作出了详细说明,突出了志书个性,都在总体或局部写得不错。特别是《赣榆县志》提出的“所记皆实录,不溢美,不扬恶,不讳过。”对自身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秉笔直书,本是历史工作者的基本修养,但似乎不容易做到。《赣榆县志》的编修者们自加压力,难能可贵。我们拭目以待。

但也有不少志书凡例写得模糊笼统,千志一面,缺少个性和特色。如: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志》

凡例二:本志记述上限为始建开发区的1984年,下限截止2011年底。为保持记述事物的完整,正文个别事项适当上溯下延。(个别事项,指什么?适当上溯下延,怎样做的?)

凡例四:本志篇目设置:从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际出发,以开发区现行的管理体制为基础,参照现代城市的社会分工、学科分类和志书篇目设置的传统进行分类,部分章节名称依照惯例,部分章节突出开发区的特色。(依照惯例,什么样的惯例,突出开发区的什么特色,怎样突出的,能不能说得更透彻些?)

《连云区志》

凡例三:本志记述时限为1990~2005年。对连云区的基本地情,作完整记载。大事记从连云区有人类活动开始记载,下延至2010年;图片、附录中收录的记述全区性重要事件的文章,时限适当下延(这个适当下延,是指相对于2005年呢,还是相对于2010年再作下延?)。编下序、章下序视叙述需要作适当上溯。(“基本地情作完整记载”,是对1990~2005年的地情作完整记载,还是贯通古今地完整记载?适当上溯和下延的“适当”如何理解?是不是该有个明确的时间节点?)

《赣榆县志》

凡例二:本志记述断限上起1990年,下迄2009年。为与前志保持衔接,部分内容适当上溯。(与前志的衔接是怎样做的?哪些部类、内容上溯了?都没有具体说明。)

二、指导思想表述不全面、不准确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于2008年9月20日颁布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中,明确提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须遵循的指导思想和编纂原则,它是我国当今修志的纲领性法规,是修志工作的总凡例,各级各类志书都必须严格遵循。她是怎么说的呢,她

说:“(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2012年十八大新修改的党章,把科学发展观列为党的指导思想,所以,这个指导思想可修改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编纂指导思想理应在凡例中有所交待,并在志书编纂中得到体现,既不能不写,也不应空写不实行。

《赣榆县志》凡例一: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求实存真”原则,实事求是地系统记载赣榆县1990—2009年间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发展状况,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全面反映赣榆发展的时代特点和地域特色,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服务。(此凡例只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没有提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不全面的。)

有的志书仍机械照搬《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中的提法,没有把科学发展观写进指导思想。如:

《连云区志》凡例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力求全面、客观、系统记述连云区境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新浦区新志》凡例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详今略古,实事求是地记述新浦区的历史和现状。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志》凡例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述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东海县志》凡例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求真务实的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记述东海县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坚持改革创新，树立精品意识，力求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县情与突出地方特色，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权威性相统一。

三、凡例与正文互相矛盾

1. 简称不一致。《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凡例七：“记述中多次涉及地域、机关、团体或会议名称时，在志书单元（“序”、“概述”、“章”等）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再次出现时则用简称。例如：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连云港开发区”），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连云港高新区”），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简称“管委会”）。”实际十志稿中都简称“开发区”“高新区”“区”。

2. 人物排序不一致。对于人物排序，目前凡例中说明的只是人物传略，简介按生年或卒年排序，烈士名录按牺牲年月排序。但在实际编排中，还有很多不同的排序方法，如领导人按任职时间，同年份的劳模、先进人物按姓氏笔画或获奖先后顺序排序等。应再作细分。

《连云区志》凡例十：本志人物编在前志的基础上，重新载录，下限至2005年。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兼顾客籍。人物排列以生年为序，对业绩卓著的在世人物，以事系人，人随事出。革命烈士、市级以上先进人物、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名表入志。（此中的人物排列顺序是指立传人物，那简介人物、名录和人名表中的人物怎样排，没有说明。）

3. 纪年方法不一致。凡例规定“一律用公元纪年”，实际做不到。《东海县志》凡例八：本志纪年，一律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年份括注历史纪年或民国纪年。（作为断代志，主体用公元纪年是对的，但因为个别编章节有上溯，所以也涉及朝代历史纪年，在这个时候还一律用公元纪年就绝对了，公元纪年括注历史纪年或民国纪年更是不

合常规。）

4. 篇目叙述与竖写单元不一致。《连云区志》凡例五：本志遵循科学分类原则，结合社会分工，合理划分门类，分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五个部类，依次排列（实际这五个部类没有明分，只是暗分，所以不存在五个部类，只是在实践过程中遵照这样的顺序排列罢了）。各部类内分编、章、节、目四个层次，事以类从，横排竖写。（实际还有子目层次）

《海州区志》凡例二：本志按照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相结合的原则，共设三十六编。编下设章、节、目（也有地方设了子目，应该有所交代）。志首设地图、照片、序、凡例、目录、总述、大事记。专记附有关编末。志末设附录、编后记和二级主题及表格索引。

《东海县志》凡例四：本志采用章节体，以篇、章、节、目为结构形式。各篇设章、节两层，节下之目视具体情况而设，只见于正文，篇目（应为目录）从略。此凡例告诉我们，本志纵写的单元以节为主，以目为辅。但事实是，一部志书要写好，必须在节下划分目，其或子目，这样才能做到资料翔实，层次清楚。那种在大多数节下就展开纵述的，从总体上看不会成为精品良志。

5. 体例叙述不一致。《东海县志》凡例五：本志首设领导题答、图照、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而后从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出发，依次为之。卷末设附录、编纂始末，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进行记述。（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只适用于大事记，而不是整部志书的写作体例。志书最基本的体例“横排纵述”，要在凡例中加以说明。“而后从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出发，依次为之。”句也叫人费解。凡例中文白夹杂，不知所云。

四、套用首轮志书凡例，新瓶装旧酒。主要体现在有关行文的规范中，国家已有新标准了，而我们还奉老标准为圭臬。

《东海县志》凡例八：数字用法，执行1995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计量单位，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



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准；标点符号，严格遵循1995年12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地图以测绘部门的公开资料为准。

《新浦区新志》凡例十二：本志中的数字书写一律按1995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之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规定》执行；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标点符号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5843-1995）标点符号用法》使用。

此两例中的“数字表述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GB/T15835—1995），已被《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GB/T15835-2011》代替。2011年7月29日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发布，2012年11月1日起施行。同样地，标点符号也要以《标点符号用法》（GB/T15834-2011）为准，不再用1995年的。新志书，新规定，不能墨守成规，而要与时俱进。要善于学习和汲取新知识，不能新瓶装旧酒。

《连云区志》凡例十二：本志使用的数字、计量单位等均按2012年11月1日新实施的《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若涉及上级有关文件中关于农耕地面积，仍沿用“亩”为计量单位；文字、标点按国家所定规范书写。意识到了要用新规定，但文件名还是旧的，新的文件称《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灌云县财政志》凡例五：现用地名以1983年灌云县人民政府公布的灌云县地名录为准。是不是太老了？那1983年后的新地名呢？地情县情发生了变化，我们的修志也要及时跟进。

五、不合志体或违反有关规定，主要体现在交代资料来源或引文出处和计量单位、数字用法方面。

《连云区志》凡例十五：本志资料主要由各部门提供，有的采自历史文献、档案和口碑，均经核实，文内不再注明出处。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志》凡例九：本志资料均经连云港开发区各相关单位核实，入志时不再注明出处。

《新浦区新志》凡例十四：本志资料采自有关文

献、档案、报刊、专著和口碑，并经鉴别核实，一般不注明出处。

《东海县志》凡例十一：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历史档案、政府统计资料、各种专著、年鉴、报刊文章和调查采访，以及本届修志期间县内各党派、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编印的专门志和书稿等，文内一般不注明出处。

中指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四十条言明，“引文和重要资料注明出处”，“不注明出处”明显与《规定》不符。

《东海县志》凡例七：本志使用数据，以统计部门数据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数据，以行业主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为准，全县总面积以民政局公布数据为准。数字以阿拉伯字为主（表格内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赣榆县志》凡例八：本志除引用历史文献外，一律用语体文、简化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旧式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制。数字书写用阿拉伯数字。

上述两例中关于阿拉伯数字用法的叙述绝对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15835—2011《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相比1995年的标准，在汉字数字与阿拉伯数字中，不再明显倾向于阿拉伯数字。在叙述时，可以说“遵循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而不要说“主要用阿拉伯数字”。

（作者系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 张伟敬



《连云港市海州区志》 (1986~2005) 编修过程中注重把握的几个问题

孙大伟



《海州区志》编纂团队成员合影。

(左起:马善臣、王敏先、孙大伟、谷胜玉、张峦耀)

《连云港市海州区志》(1986—2005)经市志办组织的终审和验收、省志办的审核和区政府批准,于4月下旬出版发行。回首编修过程,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始终注重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把握好志书框架的设计

框架设计实际是一本志书结构的艺术。正像有

些编纂者形容的那样:结构好了,这本志书就立起来了。结构不好,志书便似剔了骨头的肉,提起来是一串子,放下去就是一摊子,与“精品良志”不搭边。我们在设计志书的框架时,力求科学合理地制定编目,一是根据“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按照自然、经济、政治、人文、社会等大部类的基本元素设



置纲目,并按此纲目征集、补充资料,全志最后确定设36编;二是对照海州区前志的纲目拾遗补缺,补齐断限内的元素;三是在编、章的设置上尽量做到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四是纲目设计请市志办把关,召开研讨会,听取意见,取长补短;五是在编纂和修改过程中,根据上述原则及占有资料等情况不断微调 and 修改,使志书较好地符合编纂体例,体现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二、突出海州的地方特色

古今修志的历史证明,突出特色是修志的必须之举,鲜明的地方特色,是一部名垂佳志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特色的志书不能算是成功的志书。海州区在连云港市的行政建置中,既不具备连云区的港口特色,也非新浦区地处全市政治、经济中心的优越位置,城区功能相对较弱。海州区志作为连云港市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找准和突出自己的区情和特点,这样才能为编写出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志书奠定基础。海州区志体现的地方特色,当然是指海州在连云港市及周访地区最有影响的事物。海州,是一座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古代名城,苏北、鲁南之间海属地区的治所,连云港市的摇篮。其历史上所辖的范围,不仅包括现今连云港市市区及所辖各县,还包括沐阳县。海州这座古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至今仍超越时空和辖区。从记述海属地区历史的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以及之前的清《康熙海州志》、明《隆庆海州志》,到今天仍大致维系的县和乡、镇建置;从目前仍存于世的海州大地上众多古建筑、古石刻等古文化遗存,到“凌惠平”等为代表的丰富的地下文物;从古海州地区有二千年历史的宗教文化到海属地区的海州五大宫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艺及民风民俗;今日的港、台地区仍有海州同乡会,等等,仍以不同形式在当今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影响。现在,古城海州尽管已成为连云港市所辖的一个区,但她那古老的历史文化,她的影响和辐射力,仍使古城成为其所在的海州区最突出的地方特色。为此,我们专门设置了“古城海州”编,下设古城池、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石刻、石雕、方志诗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管理与保护共8章29节及记事,力求把古城的内涵作为一笔历史财富完整地奉献给世人。

“古城海州”编不但容量较大,还将其放在本志的第二编,突出这个极具地方特色的编目在志书中的地位与份量。其次,在农业、土地、商业等相关编章的无题序中扼要地阐述古城海州历代经济、社会等发展状况,增加读者对海州历史的了解。第三,在志首彩页中摘编、绘制、标注了几幅古海州政区变动示意图,其中“海州直隶州政区示意图”标注了当时海州(包括今东海、灌云县和灌南县北部)的政区和所辖乡镇,让读者大体了解海州的前世今生。

三、突出时代特色

新一轮修志,断限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约20年左右。其间,改革开放大潮席卷全国,社会经济生活和百姓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无疑是编修二轮志书最显著的时代特色。将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以及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显著变化,作为新一轮志书的重点内容,是方志界的共识,也是我们在编纂过程中注意认真把握的一个重点。

1. 改革,写好几个重点篇章

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步在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推开。我们在设计编目时,考虑到改革涉及到全志大部分编章,不宜设立专编专章,而是将改革内容放到各个编目中。针对各个领域改革进程不一、力度和效果有差异的状况,我们决定写好几个重点篇章。

首先是农村改革。党中央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了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内容的农村改革、提高粮棉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和降低农用工业品销售价格等重大改革措施。20多年来,海州区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都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显著。我们将农村改革作为重点内容,集中记述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土地经营制度改革、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and 流通体制改革、农村经济管理改革、农村社会化服务体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种植业结构改革等方面的内容。另外,在“民政”编中增加农村村委会改革,在“精神文明建设”编中增加文明村建设等内容,进一步在志书中体现



和完美农村改革的方方面面。再如供销、蔬菜 and 粮油购销等商贸流通体制的改革,劳动就业、工资、社会保险、城镇住房等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工业管理和经营机制改革、教育教学改革等相关章节,都放在志书每编记述事项最前面的醒目位置,以突出其重要性。

2. 开放,记述重大成果

经济开发区的出现和开放型经济的形成,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也是这本志书断限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为此,我们单独设置了“开放型经济”和“开发园区”两编,放在记述各项经济工作的最前面位置。这两个篇章,重点记述了海州经济开发区和洪门工业园区的立项、规划布局、开发与管理、经济发展及企业规模等崛起、发展的全过程,记述了 20 多年来海州开放型经济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轨迹。

3. 文明新风,传递正能量

“五讲四美三热爱”“四有”新人、文明单位等等出现,无疑是断限内人们精神领域里一个显著的时代特色,这也是与经济领域内改革开放成果相辅相成的。我们在志书中专门设置“精神文明建设”编,设置思想道德教育和建设、文明创建及文明新风等章节,分别记述改革开放促进社会的变革和给人们的精神面貌带来的深刻变化。其中关于献爱心、送温暖、见义勇为等文明新风的记述,传递着正能量,彰显了时代的特色。

四、处理好与前志的衔接

海州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民俗风情,至今仍在这个地区的老百姓中间代代相传。续修的海州区志,如果抛开历史,只记述断限内的社会百态,那便成了无源之水。设想读者拿到一本新编的续志,要了解事物的源头,还要去翻看前志或者查阅其他志书,那么这本续志就不可能成为一本合格的断代志。所以在续修海州区志时,我们坚持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凡在有历史传承的篇章中,均在序中追溯历史,简述历史传承和发展脉络,实现与前志的衔接,承上启下,使续志成为既简单了解地方历史,又详细掌握现状的地情书。同时,这些关于历史传承的追溯,也进一步补充、完善了志书的地方特色,便于读者从各方面去了解海州的历史与传承。

五、保持全志行文风格的统一

在志书编纂过程中,深感全志的行文风格必须统一,这是志书质量的基本要求,否则就失去了可读性。在编纂初稿阶段,我们发现各承编单位报上来的资料长编和初稿,以及各位编辑同志编写的初稿,限于各人的行文习惯和文字水平的差异,行文风格不尽相同。对此,编辑部要求文风必须统一,端正,做到文字严谨、朴实、简洁、流畅,通俗易懂,行文层次清晰。按照志稿总纂一支笔的要求,由主编全程介入。

在初稿编写阶段,主编即介入对已完成的初稿进行逐编修改,然后由编辑按修改意见与承编单位沟通,请承编单位主要负责人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原编辑补充和调整,主编再次修改,形成分纂稿。其次,2011 年 7 月,区两办发出《关于做好〈海州区志(1986—2005)〉分志稿评审的通知》,由各承编单位主持,区志编辑部参加,邀请所属系统专家、前任领导及知情者,分别对志稿进行评审(即复审),并逐编形成《评审纪要》,主编依据这些评审意见,逐编对分志稿进行修改增删。在此基础上,由主编对志稿进行总纂。第三,2012 年 7 月市志办组织的终审结束后,对志稿的修改以及此后对验收稿的修改和出版社审稿后退回来志稿的再审阅,全部由主编负责。这样,主编不但直接参与志稿的撰写,及时对初稿和分纂稿进行修改,而且总纂及以后对志稿的逐次修改,都是一支笔,切实保证了志稿行文风格的统一。

这本志书的编纂工作从 2006 年 5 月启动,到出版整整经过 8 年时间,其间由于人手少、一部分承编单位撰稿人员变动频繁致资料长编不能按时上交等原因,进度不是尽如人意。好在全体编纂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恪尽职守,总算不辱使命,尽了这份历史责任。志书虽已出版,但限于编纂者的水平以及一部分资料的缺失,恐怕还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与不足,阅读者如发现讹误之处,希不吝指教。

(作者单位:海州区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张伟敏



浅议《海州区志》 的科学性

张树庄

2014年4月,《海州区志》(1986-2005)由方志出版社正式发行。该志是我市第二轮修志过程中第一家正式出版的区志。《海州区志》的出版,不仅在时间上占了第一,在志书的质量上也是值得称道的。我曾经参与《海州区志》的评审,认真地通读过该志志稿。在新书拿到手之后,我又认真地翻阅了一遍,给我最大的感受是,该志是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是一部高质量的新志书,尤其在坚持志书的科学性方面是一部上乘之作,堪称良志!

1986年12月,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地方志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有时代特色的资料汇集,是地方的科学文献”,“地方志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科学的资料。”并指出“地方志的编纂者要逐步提高地方志的科学水平。”1991年4月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提出提高志书的政治质量和科学水平这一中心议题。该会议纪要指出:“志书的政治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使方志准确、真实、客观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

海州区志办的同仁在修志的过程中坚持运用科学的方法,着力于提高志书的科学水平,确保志

书的政治质量,较好的解决了志书的科学性问题的。

这里首先说一说《海州区志》在资料运用方面的科学性。《海州区志》(1986-2005)约180万字。按照一般规律推算,收集资料的初始阶段,通过文献资料、口碑资料、音像资料、事物资料所汇集的内容到整理成资料长编,再到出版成书,所收集资料分量的比应该是100:10:1,在如海如烟的资料中,运用书证、物证、人证、理证的方法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资料考核和资料处理,其艰难的程度令人惊叹。正如方志出版社在《审稿意见》中所说:“全部志稿的文字编写质量较好,资料充分,设目框架合理,记述细致,在如此之大的内容含量中,一般常见的相关内容难免形成记述交叉的问题,在该志中处理得较好,因而使得该志的资料性明显加强。”更让人钦佩的是海州志办的同仁具有不护短、不遮丑的勇气,对上部志书中的错误进行勘误,竟多达246处,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令人佩服!志书是用资料说话的,资料是志书的生命。科学的、丰富的资料是一部志书科学性的表现。

《海州区志》篇目设计的科学性也十分明显,很有特色。地方志是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书,它的科学性,首先应通过篇目的设置反映出来。篇



目设置是志书之本,科学分类又是篇目之本。《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中明确指出:“地方志篇目确定和取舍,应合乎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实际,突出时代性特点和地方特色,做到设类合理,归属得当,层次分明,排列有序。”《海州区志》在篇目设计的科学性方面首先表现在能够体现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正如他们在书袋上印的两句话:“突出时代风貌,彰显古城特色”。海州是我市历史上州郡所在地,志书前置7幅地图,从这7幅地图的变化可以看出海州在地域上、行政区划上的不断演变,给人非常清晰的印象。《海州区志》的篇目设置,横排门类,以社会分工为依托,门类齐全,结构严谨。纵述事实,简繁适度,突出重点,内容丰富,无混淆杂芜之感。志书共设36编,专设有环境编,第九编是“经济总情”,对1986年至2005年海州区经济发展及总量作概括的介绍。第十编是“开放型经济”,主要介绍这20年来招商引资、对外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几方面的工作,突出了改革开放以后海州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果。科学性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是突出地方特色,突出重点。大家都知道,海州是一座古城,是我们连云港市上古文化的发祥地,是我市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面地下的文物数不胜数。《海州区志》对此作了升格处理,在第二编就设置了“古城海州”,介绍了古城池、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石刻、石雕、方志、诗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管理与保护,最后在专记中专门介绍千年古尸凌惠平出土记。古老的海州,丰富的文化遗存尽陈在读者的面前。篇目的科学性还体现在作为志书体裁本身的特点。《海州区志》能做到述、记、志、传、图、表、录、考八种体裁具备,并且做到有机的统一。

事物表达的科学性是《海州区志》另一个比较突出的特色。事物表达首先要做到志书结构安排上的整体性,对所反映的事物进行科学的“横分”。《海州区志》在篇目分类上做到了门类合理,归属得当,层次分明,排列有序。事物表达的科学性表现在科学地记载和反映客观实际情况。在对各种事物的记载上,要能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有价

值的基础资料和可寻线索。区志的二、三、四、五编,对海州的古城文化遗存、自然环境、人口情况、国土资源等自然科学范畴的内容作了较详尽的记述,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该志在社会科学方面留下的资料更为全面、具体,十分宝贵。阅读志书会发现该志在事物表达上条理清晰,内容具体,要点突出,观点鲜明。没有夸张、没有掩饰,成为一部信史!真正起到了存史、育人、资政的作用。在2014年4月19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存史、育人、资政,做好编修工作十分重要。”存史、育人、资政是新方志的历史责任,更能体现事物表达的科学性。

新方志不仅要全面系统的反映一地的历史和现状,还要正确地反映、正确地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海州区志》在记述事物、时间和人物时,能够做到寓观点于记述之中。志前彩页的第18、19页的标题是“经济总情——‘十五’至‘十五’期末之年,海州区经济发展主要指标”。这里一共有7幅图,有6幅是柱状图,1幅是饼状图,简洁明快地将1986—2005年间海州区经济发展的情况展示在读者面前。该页还附了263个字的简短说明,虽然惜墨如金,却凸显了“寓观点于记述之中”的科学手段。至于文中的记述,更是如此,尤其是通过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方面内容的铺写,把社会的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自然而然地表达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海州人民坚持改革开放,克服重重困难,取得显著成绩的历史事实。

寻求科学方法,提高志书的科学水平,确保志书的政治质量,解决好志书的科学性问题,《海州区志》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地榜样!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张伟敏



求真见秉性 存实显真功

崔月明

读新版《海州区志》有感

徜徉史海,流连志林,是我一大嗜好。或寻古,或探幽,或求证,或考据,数十年乐此不疲。时有所感,偶有所得,总是信笔由录,自寻一些乐趣。近获新版《海州区志》(1986—2005),不由欣然,用十多日浏览一遍,其感赏心悅目。因为一种缘分,我有幸被聘为这本志书的特邀编辑,参与了部分章节的撰写,参加了一些章节的评审。所以,今日捧读在手,更有一种别样的心情。

该志为一部断代志,上限起于1986年,下限止于2005年,为1999年版《海州区志》的续志。全书设36编,洋洋洒洒188万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海州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的历史与现状,突出了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多元化大背景下,海州地区一个时期社会和自然全貌的记录,一段历史和现实的折射,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科研价值。

一座城市的文化,是这座城市的另一种高度。每一代人都都会努力以各种方式增加其文化的内涵,并不断地创造辉煌。海州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积淀深厚,自古就有编修地方志的文化传统,历代相继,延续不绝。可惜千百年来,沧海桑田,几多兴衰,文本散失颇多,令人遗憾。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隆庆海州志》《康熙海州志》《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等几本志书,保存了古海州地区许多社会历史发展方面的宝贵资料,弥足珍贵。各个时期编纂的方志,各有其自身的特点,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这一本《海州区志》与历史上旧方志相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很大的突破,是“盛世修志”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个新的体现。其内容、观点、指导思想、体例结构、功能和应用等方面,远远超过历史上的旧志书。比较而言,一是对部分重要史实进行了重新考证和校订,并根据史实的重要程度,作了必要的增删,使之详略得当,更趋科学性和合理性;二是紧跟时代步伐,真实地展现了海州区在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壮美画卷,更具时代感和鲜活感;三是补录了前志未收的许多重要史料,涵盖面更广,内容更丰富。概括来说有三个显著特点:

1. 严谨求实,继承创新

态度严谨求实是治史的重要基础,占有大量丰富的材料,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编纂人员的工作态度是决定成功的重要保证。这本《海州区志》的成功就是有一个态度严谨、求真务实、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编纂团队。成书的7年间,他们暮天伏案秉书,每一个事件都认真鉴别核实,每一个章节都是几易其稿。主编孙大伟先生事必躬亲,从开笔时的满头黑发到收官时的满头白发,可谓殚精竭虑。

新版《海州区志》继承了以文字为主、以图为辅的成型方志的优秀传统,体例完备,内容丰富,统合古今。但又不为所拘,有所创新,对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新事业、新内容,根据实际状况和需要,设立新的章节予以反映。新增的内容记述了新发展、新风尚,很有时代新气象,科学合理的体现了修志的指导思想、方针和原则;做到了志书篇目的思



规范性、时代性、地方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完整地反映了海州区的基本面貌和发展特点,多处篇章弥补了该地区旧方志上记述的空白,为将来研究海州的历史文化存留了许多极具价值的文献资料。

2. 薄古厚今,古今兼顾

地方志既然是“一地之百科全书”,其所志之门类自然应该全面一些,尽可能多地反映一方之自然面貌和社会现象。新版《海州区志》做到了这一点,它的门类大为扩充,真实、全面地反映了海州区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从内容上看,所涉及资料范围相当广泛,内容全面,史料翔实。该志为保持记述历史的连续性,在编及章下设序,扼要纵述断限前的历史,如“大事记”“社会生活”“宗教”“人物”等篇章,简要地追溯历史,阐明其发展和演变,基本做到了纵述历史、横陈现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经济价值和参考价值。特别是把《古城海州》列为专编,对古城池、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如实记录了家乡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让子孙后代了解家乡、认识家乡,让他们为家乡的历史骄傲和自豪,从而激发他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激情。使其自觉地用地方文化滋养家园,把古老的传统文化与蓬勃向上的现代文明相互融合,对提

升这座城市文化品位、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等,将会产生广泛而深入地影响。

3. 科学准确,层次分明

地方志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史和志的统一体,内容的科学性、标题的准确性、大小子目的从属性,是一部好志书的关键。新版《海州区志》在体例结构上采用编、章、节、目的方法,体裁以志为主,兼用述、记、传、图、表、录,做到了以纲统目,体例规范统一,结构严谨,篇目设计合理,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开卷了然。它汇集了各方之卓见,真实的展现了改革开放以后一个时期海州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壮丽画卷,对本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的可持续性发展,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特别是新增加全书“索引”,按标目首字的音序排列,同音节的按声调,同声调的按标目词第二个字音序排列,全都仔细分隶归类。标目后还附有此目内容所在的页码,主册索引后列表格索引,正文中凡具有独立检索意义的资料,均可通过此索引查找到,查阅十分方便。人性化到如此程度,可见编纂人员的良苦用心。

新版《海州区志》最初的设计构想和目前达到的目标是一致的,它的出版是我市史学界的重要科研成果之一。这项成果的取得是海州区委、区政府

领导高度重视,各部门共同协作,以及全体编纂人员辛勤工作的结果。求真见秉性,存实显真功,编纂者用认真的工作态度、独特的文化精神和敏锐的观察视角,把海州一段恢弘的历史记录下来,变作一笔精神财富献给这座充满人文气息的城市以及浸润于这座城市里的人们。相信各位读者一定会到这个博学的世界里,去领略,去感悟,去体会,在不知不觉中把故乡古朴而又厚重的“土性”,自觉地融进自己的血脉。

(作者崔月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连云港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责任编辑 于冰清



新版《海州区志》



海上丝绸之路 说云台

水 荣

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里,随着中国北疆铁路与苏联土西铁路接轨,一条东起黄海之滨的连云港,西出新疆阿拉山口,横穿西欧大陆,终抵荷兰鹿特丹的“新亚欧大陆桥”全线贯通。连云港作为这条亚欧大陆桥的东端桥头堡,屹立在亚洲的东方。站在云台山上俯视东桥头堡的雄姿,回顾世界文明的开发,可以清楚地看出,传统的丝绸之路正是这条陆桥的前身。古代连云港地区是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连接点,既是这条陆桥西去的起点,更是东延的门户。

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车同轨”,在东海胸界中立石为秦东门。而陇海铁路正是在由东海到咸阳的交通大道上建起来的。这条路早在秦始皇时就已经是一条“国道”了。从胸县海边西至洛阳,将陆、海丝绸之路连接起来。秦时的徐福东渡,其中一个出发点就是今连云区的西墅。西墅,古代称西市(读fú),即徐福。徐福又写成西市。徐福东渡经讨韩国的济州岛,该岛东南海岸中部的西归浦市临海绝壁



“佛从海上来”

上,刻有“西市讨此”四个大字,这应当与从西市出发的这支队伍有关。徐福东渡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海上航行。因此,说明这里乃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

宿城的法起寺建自汉时,寺里的鬚峰石塔是专为汉代康居国僧人“灭度于此”而建造的。在宿城还有“罗汉墓”的遗迹,这里长眠着到中国来传经布道的西域僧人。康居国的高僧康僧会还来讨宿城,并留有“留仙泉”的遗迹。康居国是汉代西域的一个古



国,位于我国阿尔泰山以西,哈萨克斯坦境内,是古代丝绸之路西出主干道之一。康居国的僧人到东海之滨的宿城,说明这里与西部陆上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往来密切。“佛从海上来”5个鲜红的大字写在恢复新建的法起寺的围墙上,它在告诉人们这里还应该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法起寺中的高僧也可能选择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如今的宿城。这真如赵朴初先生说的“海上丝绸之路早开”了。

连云港北端的東西連島,旧称應遊山。應遊山与后云台山之间的海峡称應遊門海峡。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交通要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据《山东通志》称:應遊門海峡“海道第一程也”。东为應遊山,西为孫家島,兩山對峙為門,船所必由,谓之“應由門”。《江南通志》称:“應遊山在州东北海中,去平山(指前三島中的平山島)十五里,元时海运之所经也。”此处海上交通要道,历史上久为人重视。汉吕母屯兵,晋孙恩据守,南北朝时侨置青冀二州,唐宋时代成为海上交通门户。经由應遊門的海上航行称得上是一条传统的海上航路。

公元632年,朝鲜半岛南部新罗的慈藏法师入中国求法,曾经历應遊,他在新罗阜龙寺内建了一座九层宝塔,将该塔第五层命名为應遊。應遊山在新罗人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新罗人在云台山一带的活动十分频繁。他们在这里建有新罗人宅,有许多新罗人在此做官供职,或经营水运、习禅敬佛,以及定居农作,宿城村中的“新罗人宅”就是新罗人的定居地。云台山成为新罗人在中国的“特区”。唐朝时日本和尚圆仁来中国求法,也曾多次泊船和经付應遊門,在这里祭祀山川,泊船候风,去宿城新罗人宅等。

1986年,连云港市文管会在今墟沟龙门湾原海水浴场的西侧修建浴场更衣房的工地上发现了一处陶瓷堆集。经鉴定,这些陶瓷碎片有铜官窑、越窑、龙泉窑、邢窑以及景德镇等地产品的瓷片。堆集较为丰厚,属唐宋时期的历史遗存。这些陶瓷碎片堆集,说明这里是唐宋时期中国陶瓷输往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的重要中转港口。唐代中叶以降,中国和丝路东端一些国家的交往达到了高潮。这条作为海上丝路的主要组成部分的东海丝路,不仅仅是

传布精耕养蚕、丝绸贸易的丝绸之路,也是一条重要的陶瓷之路和文化交流之路。

1986年,在连岛上建吹泥站,把應遊門海峡航道底部千年的沉积吹送到连岛的后沙滩。发现在應遊門海峡的海底,埋藏着上至汉代的五铢,下至明清的钱币,且杂有其他文物。吹出来的这些钱币中,有唐代铸造的背面铸有新月纹的“开元通宝”,另外像“天圣元宝”“天禧通宝”“至和通宝”“熙宁通宝”等共计20多种。以唐宋明清的钱币最多,其中十分有趣的是,从淳化通宝开始,按照北宋的年号排下来,竟然基本完整:淳化、至道、咸平、景德、祥符、天禧……一直排到元祐通宝。这些钱币的发现,充分反映了这条海上通道悠久的历史 and 繁忙的航运。

元明两代,應遊門是海上漕运的必经地。国家从水道运输粮食,供应京城或接济军需,大部分经过这里。明代,其运道由云梯关历新坝,付應遊山、安东卫、石臼所,经胶州东北转成山卫、刘公岛、威海卫,入直沽、抵天津,共3390里。这时的應遊山成为沿海粮道必经之处,并增设了航海标志,白天用标旗,晚上用灯光导航。“沿途立墩表识,使舟人知所避,而海险不为患。”直至今天,墟沟西侧的平山还保存有作为航海标志的“旗杆夹”,连云街道东侧还保留有“旗台嘴”的地名。清代曾经实行过一段时间的“海禁”,原来漕运所经过的應遊山、竹岛、庙前海湾、南城等沿海停泊设施全部废弃。直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海禁才大开。海禁开撤,海运复兴,促使连云港地区沿海港口的繁荣。这一地区海口贸易在清时得到发展,经久不衰,直至近代,为本地区交通运输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云台山是中外交通长期使用的大门。通过應遊門海峡出海的航渡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延,无论是统一的集权国家时期,还是南北朝分裂时期,北部中国与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的交通皆可通付魯南、苏北沿海的航渡而完成。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志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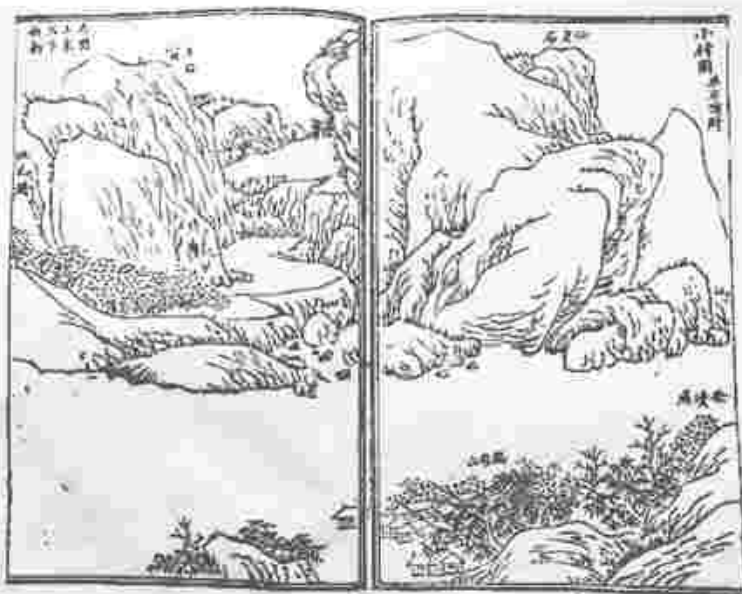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于冰清



小村曾设宰相府

——《寻古云台十八村》之三

伏广喜 张茂田



清《云台新志》上的小村图

小村,是相对于大义村的俗称大村而言。小村并不小,其面积、人口在花果山街道办事处现行9个行政村中,分别排在第5、第4位。而从寻古角度而言,小村自有小村的特色,同样不在大义、当路等村之下。

在小村,不论是垂髫老者,还是垂髫少年,都知道这里原来有个宰相府,是唐朝宰相殷开山的府第。唐僧之母殷温娇是该府的千金,唐僧之父陈光蕊就入赘于这个府第。这些看似平常,其间却蕴藏着一段跌宕起伏、生离死别的故事。明代大文学家吴承恩就是以此故事为蓝本,并吸收云台山地区其他的一些地方掌故、风土人情,写出了旷世巨著《西游记》。

关于唐僧家世的传说乃至取经故事,唐朝就有了雏形,后演绎出众多的诗话、杂剧、话本等,使故事日趋成熟、丰满。目前,这一传说在海屋地区一些老人中依然被津津乐道。据笔者所知,唐僧家世传说主要有《三元世家的传说》、《三元宫和团圆宫》、《蜘蛛精戏困陈状元》等版本,内容大致相同。主要讲陈光蕊与殷温娇相识成婚、遇难及最后一家人团圆的经历。这些故事,较之《西游记》第9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有众多的相似之处。一是主要人物相同。即陈光蕊、殷温娇、殷开山、陈母、玄奘、龙王、龙王三太子等。所不同的是害他们的元凶,前者是蜘蛛精,后者是强盗刘洪。但吴承恩没有放弃蜘蛛精这一素材,而是把它放在第七十二回《盘丝洞七情迷本濯垢泉八戒忘形》中使用,使之更加出彩,成为《西游记》中名篇之一。二是故事情节相同。都是陈光蕊与殷小姐完婚后,去海州(《西游记》第9回为江州)赴任途中,厄运



光慈,陈光慈遇害落水,殷小姐被抢走。后殷小姐在妖怪(强盗)不知晓的情况下,生下婴儿(即后来的唐僧),迫不得已放在一块木板上,送入海(江)中,让其逃牛。最后被人收留。三皇结局相同。陈光慈遇害落水后,都是被他之前放牛的一条金色鲤鱼——龙王三太子(《西游记》第九回中为龙王)搭救,一家三代终于团圆回到宰相府。所不同的是,前者为龙王带领3个太子和虾兵蟹将,将蜘蛛精诛灭。后者为宰相殷开山点兵将杀状元、抢小姐,冒名顶替窃得海州官的强盗刘洪正法。此外,在民间故事中,陈光慈被救后,龙王又将三个女儿(三龙女)都许配给陈光慈,后生出三元。除了故事相似之外,唐僧家世传说与《西游记》第9回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特点,即二者那抹不去的古海州元素。陈光慈、殷温娇、殷开山、玄奘、三元兄弟等无不深深地烙上古海州的印记。

也许很多人会说,当今争名著背景地和名人故里成风,《西游记》背景地古海州、花果山是当代连云港的一些文人附会出来的。不是也许,是真有人曾撰文这么说。那么,古海州、花果山是不是当代连云港的一些文人附会出来的呢?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不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的家世我们暂且不谈,现在,我们只列举一下与殷开山宰相府有重要关联的唐僧一家与古海州、云台山乃至小村有联系的史料便知答案。

晋干宝的《搜神记》:“东海陈子春名慈,生三子,得道云台,为子微,为清虚,为洞阴,以官天、地、水三界。”

明张朝瑞的《东海云台山三元庙碑记》:“三元大帝,东海人,父尊,子光慈,一字子春,唐贞观己巳及第,玄相殷开山妻以女,生三子,官天、地、水,因尊为三元三官三品。”

明泰兴王《云台山三元庙碑记》:“三元出自大唐,产于斯土,遗址尚存。”

清康熙《三元庙田地碑记》:“三元大帝,溯及从来,因知帝姓陈氏,讳光慈,唐贞观时状元,诞育三元,圣躬东海……”

清帅颜保《重建云台山三元宫碑记》:“考之三元,生于海州,得道云台。”

清姚陶《登云台山记》:“小村,为唐宰相殷开山

故里,殷有女赘陈状元光慈为婿……盖世俗相传也。”

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殷开山相居小村,召陈光慈为赘婿,妻以女,生三子为三元。”

这中间,晋干宝的《搜神记》比《西游记》要早六七个朝代。《东海三元庙碑记》的撰者张朝瑞,《云台山三元庙碑记》撰者泰兴王,与吴承恩同处一个朝代。

这些史料充分证明,古海州、花果山作为《西游记》的背景地,不是当代文人附会的产物,而是早就存在的客观事实。而小村,是《西游记》这块背景地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史中的殷开山有的说是陝户县殷家坡人,有的说是山东单州户县殷家坡人。《旧唐书》《通鉴》《通典》则指殷开山相居江苏。而唐僧则为今河南偃师陈留镇人,与古海州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些,并不影响传承多少代并被众多历史文献反复转载的云台山唐僧家世与古典名著《西游记》的完美对接。因为唐僧家世传说和《西游记》都是一种文学形式,而不是史书。

这个殷开山宰相府真是不简单啊,不仅走出了一代圣僧唐三藏,还走出了对以后古海州宗教崇拜产生重要影响的三个重量级人物。即三元兄弟或者说叫三元大帝。

从古海州宗教建筑表册中可发现,建筑数量最多的道教供奉三元的建宗。如清风顶宗教建筑群主建筑即三元宫。在其三十六房头中,排在第一的则为藏经阁,即团圆宫。在小村南鸡鸣山上有三元家庙,大村西北和凤凰城北门分别建有三元行宫,塘沟十字街头建有三元庙。凌州东山坡建有一座团圆宫。而海州属具轸榆建有6个三官庙。国内叫三元的庙宇也不少,而如果想看到三元“全家福”神位只有到云台山来。像三元宫建筑群之藏经阁,神龛上有前后供奉着9尊神像。他们分别为陈光慈夫妇、玄奘、三元及他们的母亲三龙女。这大概是三元出身云台的缘故吧。

尽管时光已过去上千年,在小村依然可以找到昔日的宰相府的一些遗迹。据花果山街道办事处办朱开亮老人介绍,殷开山宰相府过去就坐落在小村水库的大坝下,那一片土地过去叫东大营。明清时期,其遗迹是去三元宫烧香的香客们小歇的地



方。据一些老人讲,过去这里是一片上下园台地。上园有三四亩地大,下园有五六亩地大。有一位李姓大伯过去在那片废墟上刨土刨出讨石臼一对以及不少篆刻讨的块石,还挖出一串古钱币。上世纪60年代初,有人在这里挖出一把带有“天宝”字样的宝剑,后交市博物馆收藏。在下园东侧,过去有一口枯井。如今,这片废墟已被一排排民宅所代替。

作为宰相故里的小村,文化底蕴是丰厚的,有不少人文、自然景观可供游客参观浏览。从村中心向东北方向出发,便进入大团山。在其山西侧,有两块嵌嵌的石柱伫立于此,一南一北,互相对应,各有3个方孔、圆孔。两石柱相距0.5米。北一块高2米;南一块断了一截,现存1.2米。石宽皆0.6米。当地群众称此石为旗杆石。这旗杆石是用于插什么旗帜的?什么时候插过旗帜?从连云港海陆变迁的历史中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清乾隆《云台山志》上就介绍:“(云台)山分湖南湖北两处,中隔万金湖,自古在大海中,康熙庚寅(1710年)辛卯间,海涨沙淤,始滴内陆。”从这段文字中可知,在公元1710年以前,从南城至当路、大义村、小村、巨平(现刘巷、西庄)、新县、诸季(现焦庄、魏麻、吴麻)一线,皆为海口,设有众多的船舶停靠点。小村为其一。这旗杆石其时是用于固定口岸标志旗的。石上3个孔用于穿绳索来绑定旗帜。云台山成为内陆后,南城至大、小

村乃至今朝阳、中云的水路运输,已改海运为河运。这河运便是云台山西、北的运盐河。它远离村庄,小村的旗杆夹再也没有派上用场。但它见证了云台山海陆变迁的全过程,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文物。

由旗杆夹驱车东岭,在一个两涧汇流之处,有一个叫鸡舌地的崖坡,是古禅兴寺(又名沉香寺)遗址。路西首,有一块高约四五米,宽长约五六米的巨石,就如一截庞大的车厢雄峙于崖坡上。石顶上镌有“禅兴寺,瞻望台,二十三年二月立”12个字。石上有残碑两截。从一些残言断句可辨为明时郟城人在此立下的功德碑。明顾乾的《云台山志》对禅兴寺是这样记载的:“曲径之中,层峦叠嶂,气聚风藏。到门始见真禅林辟地也。”寥寥数句,足见昔日禅兴寺不凡气象。

从禅兴寺向南沿石径可攀登鸡鸣山。鸡鸣山是一个独立的山体,海拔115.4米,面积1750亩。山不算大,但不失为一座文化之山。鸡鸣山上有两块名石。一为鸡鸣石,在原鸡鸣寺偏北约100米的山顶上。长4米,高2米。传说古时候有鸡立其上长鸣,故名。石上镌有“鸡鸣石古愚子赋”7字,真书阴刻。该石东南,有一摩崖石刻。文曰:“山不高兮水不深,山畔田亩请龙耕。山中草寺无钟鼓,山上金鸡报五更。”二为蜈蚣石,在鸡鸣寺南山脚。有一片深紫色,长约五六米状似蜈蚣的裸岩横陈于道下,惟妙

惟肖。《西游记》第七十三回中那条7尺多长的蜈蚣精变的百眼魔君(又称多目怪),当是吴承恩受这片巨大的蜈蚣裸岩启发而创作的。只可惜这些裸岩在上世纪90年代大多被石工毁去,现仅存少部分。鸡鸣山下,过去曾建有鸡鸣寺(又称天仙玉女庙)、三元家庙、元帝庙、观音堂等庙宇。其中,鸡鸣寺过去为四合院,有正偏殿,清嘉庆时为草寺。而三元家庙,又称团圆宫,供奉的菩萨与清风顶藏经阁(亦称团圆宫)同,据传此庙乃三元飞升之所。

(作者通联:新浦区郁洲南路翠山秀水2期C5栋)

责任编辑 于冰清



旗杆夹石



连云港地名考

蔡立志

《连云港市志》《古今连云港》《连云港市统计年鉴》以及大量介绍连云港市地情的书籍、文章中都这样写道：“连云港市古称海州”，按照地名沿革的规律，连云港市的市名应该称为海州市或东海市，甚至可以称为海宁市。而现实却不是这样，偏偏称为连云港市，这是为什么呢？这要从连云港市的地名沿革说起。

关于连云港市的地名沿革，《连云港市志》第二页有一段明确的说明：“连云港市古称海州”“古为少昊氏之墟墟，夏商时属徐州之域，西周时属青州，春秋时为鲁之东境，为郑子国。战国时又易为楚地。秦统一中国后，在今海州设朐县，属东海郡。汉袭秦制。三国时隶东海国，属魏。南北朝时，南朝宋侨置青冀二州于郁州。东魏武定七年（549年）设海州，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海州’名称。隋炀帝大业初年改海州为东海郡。唐代以后，除元代一度称为海州外，其余各朝基本上延称海州。明代海州隶淮安府。清雍正二年（1724年）升为直隶州。民国元年（1912年）1月改海州为东海县，4月析县东境置灌云县。民国24年，将当时东海、灌云二县东部沿海地区析出建连云市。”“民国37年（1948年）11月7日，连云港市全境解放，将新浦、海州、连云港及附近地区划建新海连特区，下设新海市、连云市、云台办事处。”“1949年11月更名为新海连市。”

“1950年与东海县合并，称新海县，12月12日新海连市与东海县又分置。”“1954年11月升为省辖市。”“经国务院批准，新海连市1961年9月更名为连云港市。”“1983年实行市带县领导体制，连云港市辖赣榆、东海、灌云三县、新浦、海州、云台、连云港四区。”加之1996年灌南县又从原淮阴市划归连云港市管辖，形成目前全市7500平方公里土地的辖区。

上述材料对连云港市的地名沿革的交代可以说清楚明白。从中可以看出，海州的称谓历史最长，从公元549年至1912年，断断续续1363年一直称为海州。1912年后海州仍为东海县的县城，直至1957年；其后的海州仍为县级单位海州区政府的驻地。海州的称谓一直延续了1465年。清雍正二年（1724年）升海州为直隶州，另辖沐阳、赣榆两县。1912年国民政府撤州建县，于民国元年1月改海州为东海县，海州地名被东海县所代替。民国元年4月又析东海县为东海、灌云两县，原海州所辖区域涵盖了东海、赣榆、沐阳、灌云四县；后来，直到现在的台湾人，仍称海、赣、沐、灌四县为海州属地。因此，在清代的海图上把自山东日照以南、江苏灌河口以北的海湾称为海州湾，一直至今。因此海州地名的影响可谓源远流长。

另外，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讲，东海地名也可



谓非常久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秦汉开始,连云港区域就属东海郡,三国时属东海国,南朝宋明帝泰始七年至元至正二十八年在郁洲山设东海县。从地理角度来看,从秦朝开始,由于连云港市处于秦朝国都咸阳的正东,位处东海边,建有“秦东门”,因此在其后的汉、魏、南北朝、隋、唐、北宋历朝,连云港市均为以上各个朝代的东海国门,所以均称此处为东海,或东海郡,或东海国,或东海县,直到元朝结束,经历了 1585 年。从上述叙述来看,海州地名在连云港区域存世了 1465 年,东海地名存世了 1585 年,均可谓历史悠久,声名远播,但为什么海州、东海,都没有成为连云港市的地名呢,而 1935 年被刚刚问世 2 年的“连云港”地名所代替呢?

连云港地名的产生要从陇海铁路出海口的建设说起。陇海铁路出海口早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修建汴洛铁路(开封至洛阳)时就开始酝酿。当时任清廷邮传部侍郎的海州人沈云沛极力主张将陇海铁路修至海州老窑,其优势是海域风平浪静,虽不甚深,但“于此稍加疏浚,便可与黄浦江深度相同,可在此修转运海港,便等于将铁路修至上海。”民国 8 年(1919 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在海州建设东方二等大港,认为“海州之通海深水路,可称较善”从而绘就了连云港的大港蓝图。民国 11 年(1922 年)东陇海铁路动工修建,民国 15 年(1926 年)修到大浦,民国 19 年(1930 年)大浦淤塞。1932 年 5 月 15 日,陇海铁路局长钱宗泽局长批准修建新浦至老窑铁路和港口

计划时,连云港还没有港名,此时的老窑只是一个伴有 39 户渔民的小渔村,陇海铁路当局对将建的港口称其为老窑港,或云台港,这些名称既无知名度又很俗气。1932 年 8 月 15 日新浦向东的铁路和云台山隧道已经开工建设,人们都在为港口名称而议论纷纷。1932 年 11 月 11 日,铁道部业务司司长俞琰电告陇海铁路局长钱宗泽:“建议以后云台山、西连岛两名各择一字,以‘连云’二字命为港名。”这一命名表达了海港与地理名胜的关系,而且比喻港口进出船舶如同飘动着的白云一样接连往来。1933 年 12 月 7 日钱宗泽局长复电铁道部:“码头名称已定”,“连云港涵义较广,似为合宜。”于是连云港这一具有诗意的地名诞生于世。此时的连云港只是一座码头的称谓。

“连云”又何时与行政区划挂钩的呢?这要从陈果夫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说起。1933 年秋陈果夫



1935 年成立的连云市政筹备处

走马上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就遇到了江苏省农矿厅汪寿康等人撰写的《擘画墟沟商埠意见书》。《意见书》中写道:“窃以为陇海铁路西起甘肃,中经陕



豫,中贯平浦,平汉两大干线,四通八达。全国交通脉络,因之舒畅,将来向西北开发,即可同世界接轨,其事业之伟大,人所共识。中国之繁荣,胥于斯赖”,“试设一新市政筹备机关”,“企望其如初日之升,为吾苏(省)放一异彩也”。这一意见书,使陈果夫兴奋不已,1934年春,在当时连云港与省政府所在地镇江无铁路、无公路的交通条件下,便乘飞机来连云港港口视察,飞机在港口上空盘旋三圈后返回。1934年6月1日江苏省政府召开662次会议,通过了《省政府决议规划连云港商埠市政案》。1935年1月18日,省政府召开718次会议,决定“连云港商埠设置普通市,定名为连云市”;其“水陆区域暂以临洪口以南,烧香河以北,东至东西连岛,西沿临洪河,新浦、板浦以东为范围。”从而使连云市成为继中国第一个所设广州市以来的第18个城市。其中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为院(行政院)辖市,杭州、济南、成都、广州、西安、贵阳、汉口、包头、长沙、昆明、武昌、南昌为省辖市。1935年4月23日,江苏省政府召开737次会议,决定在塘沟东门外陈小楼设立“连云市政筹备处”。陈果夫亲自物色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硕士、福建永康人赖琚为连云市政筹备处主任。1945年9月连云市建市,国民党行政院任命1935年进攻红军时被俘并随红军参加长征的国民党中将张振汉为连云市市长,以连云上海大厦为市政厅,从而标志连云市正式成立,这样就产生了连云市这一行政区划单位。1949年11月新海市和连云市合并成立新海连市,连云市名称停止使用,1961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将新海连市更名为连云港市,连云港市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从上述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连云港市地名之所以不用海州或东海、海宁等地名,关键在于“连云”地名的出现:1933年12月7日陇海铁路局钱宗泽局长呈报国家铁道部:“名称已定”“连云港涵义较广,似为合宜。”此时的老寨地处灌云地界,因此修建铁路海港的陇海铁路局认为海港的命名,与东海县及其县城海州均无瓜葛,所以不会考虑使用海州或东海作为地名的。话又说回来,即使考虑,当时灌云籍的国民党大佬江恒源、邵治田等也是不会允

许谁在灌云的土地上使用海州、东海来命名地处灌云县的海港的。

接下来是1935年江苏省政府718次会议决定在连云港商埠设置普通市,其区域面积为470平方公里,在这一范围内人口仅有10万,不符合国民政府30万人口的设市条件,但考虑到连云港特殊的地理位置,认为可建南毗上海,北毗青岛的东方二等大港,“其事业之伟大,人所共识。中国之繁荣,胥于斯赖”,因此国民政府特设全国第18个城市连云市,作江苏省辖市,当时在全国范围引起极大的轰动,地价立马上涨十多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连云港作为新海连市的三大经济支柱之一,其地位和影响迅速提高和扩大,港口吞吐量从1949年的5万吨,发展到1957年的600万吨,成为当时全国八大海港之一。1957年至1961年新海连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在江苏省建设局和国家建设部规划局指导下,完成了《新海连市城市总体规划》,这是解放后连云港市的第一部城市规划。城市定位为“以港口、码头、渔业基地为主”。因此随后国务院在决定将新海连市由徐州地辖市提升为江苏省辖市时,为了体现以港口、码头、渔业基地为主的城市定位,更好地促进这一中国历史上第18个城市“以港兴市”的发展,便将新海连市更名后的名称沿用“连云”这一称谓,加之为了突出港口城市这特色,便将新海连市改称“连云港”市。这应该说,上述情形就是连云港市名称来历的缘由!

上述论述是否正确,仅供方家参考。

(作者单位:市委农工办)

责任编辑:于冰清



连云港市水利碑补遗

张卫怀



左:三圩闸碑文



右:大圣湖识碑

因承担《江苏省志·江河湖泊志》连云港市部分的编修任务,近期对我市的水利文物进行了再次调查,新发现了清末和当代的两处碑记,现予补遗。

清末南六塘河三圩闸碑

现存灌南县李集乡久安村沈三圩庄。石碑两块,均为细黑色石灰岩。一块长0.8米,宽0.4米,正楷横书阴刻“三圩闸”三字,碑之右侧竖刻“光绪戊申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仲春重建”。另一块长1.6米,宽0.6米,右边正楷阴刻竖列:“钦命头品顶戴,升授湖北按察使司、江苏淮扬兵备道 杨(居右);钦差南洋大臣头品顶戴、陆军兵部尚书、两江总督部堂 端(居中);钦加盐运司銜、江苏候补府正堂、河南即补河务府魏(居左)”。中间一行“端”字下书“德政”二字,字体较大。碑体正中间书写正楷“泽衍宣房”四个大字。碑体左落时间“光绪戊申年己未月穀旦”和立碑者“安东县绅十公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夏秋,徐、淮、海等渰

雨成灾,两江总督端方筹办工赈,淮、海境内修筑南六塘河二道土堤。是年冬,修南六塘河堤。光绪三十三年重建三圩闸。

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由荫生中举,历任工部主事、陆军部尚书、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有《陶斋吉金录》8卷,收录商周至隋唐时期青铜礼器等359件。杨慕时(1838-1921),字雪门,一字少农,宿迁井头人。清末弃文从戎,因战功升任福山、天津、徐州等重镇总兵、江北提督。“魏”之生平事迹不详。

大圣湖识碑

文曰:宋海清寺阿育王塔,千载间突兀峥嵘,经山崩地裂,目睹沧海桑田,诚花果山下无声之历史老人。一九五八年,塔旁建人工湖,防洪灌溉两兼其利。昔时荒村苇荻顿成泽国,波光粼粼靡气氤氲。阿育王塔襟山带水,山厚其古朴,塔增其润泽,亭亭玉立,交相呼应。复有杂花遍野自开自落,鸥鸟翔集自飞自鸣,堪称进山第一美景。且夫《西游记》由花果山而得神奇瑰丽,花果山亦因《西游记》而得四海赞誉。于是游人如织纷至沓来,湖光塔影先声夺人。咸谓孙大圣之家乡得一好湖!盖名从主人虽属古训,广集群议方获嘉称,因以为记。

甲申仲秋 彭云撰文 赵斯武书

该碑立于2004年,碑文刻于大圣湖标志雕塑阴面,面北。碑面高2.25米,宽1.22米,为楷书,字径0.06米。

由彭云撰文,赵斯武书丹。彭云,江苏丰县人,连云港市著名作家,原任市文联常务副主席。赵斯武,江苏海州人,擅书法,尤擅长魏碑、隶书,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届会员。

(作者单位:市水利局)

责任编辑 于冰清

